



2020年7月28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7月24日星期五举行的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气候与安全”的视频会议上，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先生、国家战略和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马哈马杜·塞杜·马加吉上校和纽埃可持续太平洋咨询公司董事科拉尔·帕西西女士所做通报的副本，以及下列人士所作发言的副本：比利时副首相兼财政与发展合作大臣亚历山大·德克罗阁下、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先生、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爱沙尼亚环境部长雷内·科克先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部国务大臣、塔里克·艾哈迈德温布尔登勋爵，以及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印度尼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南非的代表。伯利兹外交部长威尔弗雷德·彼得·艾灵顿阁下、爱尔兰外交和国防部长西蒙·科文尼先生、肯尼亚外交事务内阁秘书拉谢尔·奥瓦尔·奥马莫女士和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以及丹麦、斐济和瑙鲁代表也发了言。

根据安理会成员就该次视频会议达成的谅解，下列代表团和实体提交了书面发言，并随函附上副本：巴西、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印度、伊拉克、意大利、日本、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利亚、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塞内加尔、斯洛伐克、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士、图瓦卢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根据2020年4月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273)中所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所附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签名)



附件1

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的发言

我感谢共同组织者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并感谢海科·马斯外交部长主持本次会议。

气候变化影响我们所有人。创纪录的气温、前所未有的海平面水平和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描绘出地球和人类危险的未来。环境受苦，人们也受苦。随着生命和生计受到威胁，资源竞争加剧，社区也流离失所。

气候紧急情况是对和平的威胁。气候变化和冲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气候变化确实加剧现有风险，同时产生新的风险，其后果因地区而异。

在太平洋，海平面上升给生计带来压力，并且由于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而加剧，对社会和谐构成威胁。

在中亚，水资源紧张和能够获取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减少有可能造成区域紧张。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预计到2050年将有超过1.4亿人因气候变化而在其境内流离失所，对区域稳定有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在非洲之角和中东，气候变化的影响加深了人们的不满，令暴力冲突风险升级，助长了极端组织。

在世界各地，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的局势更容易受到影响，也更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10个最脆弱、最没有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准备的国家中，有7个驻有维和行动或政治特派团，这绝非巧合。

地区之间、地区内部以及社区内部都存在差异。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以不同方式影响妇女、男子、女孩和男孩。在苏丹，气候变化与冲突和遗留下来的排他性决策交织在一起，加剧了资源稀缺。因此，男子往往必须离开家庭，寻找替代生计，而把妇女留在农村地区，她们发现自己处于气候变化和不安全的前线。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无疑，我们需要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和加快执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承诺。

和平与安全行为体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不考虑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这将会破坏我们的预防冲突、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努力，并有可能使脆弱国家陷入气候灾难和冲突的恶性循环。

在乍得湖流域，不安全和治理挑战阻碍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影响到生计、社会凝聚力，并最终影响到人的安全，博科圣地组织已证明它擅于利用这一点。

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根据我们在全球看到的情况，我想概述一下我们可以共同采取的一些行动，从而更有效地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

第一，我们必须利用新技术并增强我们的分析能力，将长期气候展望转化为可采取行动的短期分析。气候安全机制是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联合倡议，已经制定了这方面指导方针，支持在实地采取创新办法。

在伊拉克, 联合国援助团在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的支持下, 正在开发一个预警系统, 该系统将遥感技术与人口密度和流离失所数据分析相结合, 预测水资源方面潜在的紧张局势。

第二, 我们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必须以人为本, 并从那些每天都在经历气候变化对其安全所产生后果的人身上借鉴学习。在这方面, 我赞扬本次辩论会的组织者确保了今天辩论会观点的多样性。我期待听取科拉尔·帕西西女士和马哈马杜·马加吉大校的发言。在我们自身的工作中, 我们也正在努力了解最广泛的看法, 例如来自加勒比、中东、尼泊尔、太平洋以及萨赫勒的从业人员和基层组织的看法。

借助妇女和青年作为变革推动者的力量, 我们必须更好地使建设和平、环境和性别平等目标成为一个整体。在哥伦比亚的乔科, 一个联合国机构间试点项目正在执行《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的背景下, 促进妇女参与环境治理和自然资源管理, 对地方一级建设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 我们必须加强多层次伙伴关系, 把联合国、会员国、区域组织以及其它方面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联系起来。

由非洲联盟和乍得湖流域委员会牵头的《乍得湖流域受博科圣地组织影响地区的稳定、恢复和复原力区域战略》展示了包容性、气候和安全贯穿其中的办法的潜力, 指明了走向稳定的道路。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建立了一个关于和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联合协调机制, 该机制除其他外, 寻求找到防止该区域与季节性游牧相关暴力的良好做法。

在太平洋, 为应对环礁国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联合国正继续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密切协作, 支持《波伊宣言》的落实, 并帮助增强各国和各社区抵御灾害的能力。

在中亚, 联合国预防外交区域中心支持德国发起的“绿色中亚”倡议, 为该区域就跨界水资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合作创造有利环境。

这些根据各区域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的例子可以为其他伙伴关系提供值得效仿的宝贵见解和经验。我们坚定地致力于此类协作。

近年来, 我们在认识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 气候变化一刻也不会停止, 其巨大影响将不断加剧和演化。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并鼓起勇气, 调整我们既有的做法, 确保它们适合这个气候不断变化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将言语化为行动。如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 从疫情中恢复的过程为增强复原力和促进气候正义提供了机会。今天的辩论会让我感到鼓舞, 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我再次感谢组织者召开本次会议。

附件2

国家战略和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马哈马杜·塞杜·马加吉大校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给予我今天这次就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发言机会。我的发言将侧重于我所在区域——即非洲萨赫勒——的问题和备选办法。

我将首先谈谈气候变化对公民生计造成了多大影响，审视气候变化给区域安全带来的更广泛后果，强调尼日尔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最后向联合国提出一些建议。

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的气候变化比萨赫勒更真切。在最好的条件下，萨赫勒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尤其是对农民和牧民来说，而务农和放牧是萨赫勒居民常见的两种谋生途径。萨赫勒目前气温已经很高，平均来看在25°C至45°C之间波动，而且还在上升，预计到2060年将上升2.5°C。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萨赫勒的年降雨量在强度和频率上都变化很大。其结果是，这些年来暴雨、洪水、强风、沙尘暴和干旱频发。例如，在尼日尔，1973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3702起自然灾害事件中，有85%发生在2001至2014年之间。高温还意味着萨赫勒本已稀缺的地表水蒸发量增加，导致严重干旱。

这些天气变化给萨赫勒的人民带来苦难，因为他们中80%的人要靠对气候变化敏感的活动谋生。随着地下水枯竭，农作物减产，沙漠逐渐侵占曾经肥沃的土地，世代相传的生计正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些变化必将对区域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它直接影响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2012年洪灾和旱灾叠加，数百万萨赫勒人失去庄稼和牲畜，更加贫困。整个西非有1900万人受灾。

其次，天气变化及其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农村人口、特别是农牧民对土地、水和草场等稀缺自然资源本已激烈的争夺。在尼日尔，农村居民之间的冲突大多发生在农民和牧民之间，这并不奇怪。在马里中部和尼日利亚北部，农牧民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考虑到该区域未来的天气预报，并考虑到萨赫勒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区域之一，每年约为3%，这种竞争可能会加剧。

第三，许多人为了生存而被迫迁移。在移民长期定居的情况下，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的风险很高。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些人——主要是青年——转而从事非法活动，以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手段。国家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去年在尼日尔乍得湖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和2013年连续发生的洪灾使“博科圣地”组织招募到了更多的人员，因为有些青年在失去庄稼之后投靠极端主义运动，以此作为一种出路。

此外，阿德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里程碑式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与冲突动态是一个恶性循环中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在乍得湖区域，气候变化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冲突又损害了各社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管上述趋势可能加剧冲突，但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那么直接。

最近的多项研究一致认为，气候变化只是冲突的众多驱动因素之一。从本质上讲，气候变化应被视为一个会导致威胁倍增的因素。高企的贫困率和低下的国家能力往往是影响更大的冲突驱动因素。例如，国际危机组织2020年4月的报告显示，在萨赫勒中部，气候变化与冲突存在间接联系，因为它破坏了牧业和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脆弱平衡，损害了牧民的利益。在马里中部，这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定居牧民和游牧民在土地和牧场的使用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该报告强调,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国家没有能力适当处理此类紧张关系,因而导致暴力冲突。事实上,该地区冲突的蔓延与其说与资源的减少有关,不如说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关,这种转变导致在获取越来越令人垂涎的资源特别是可耕地方面出现缺乏监管的争抢局面。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已成为萨赫勒冲突的驱动因素之一。然而,预期的全球变暖程度及其对世界各地特别是萨赫勒居民的影响将加剧安全风险。在此情况下,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我们必须承担起个人和集体责任,做好准备。

为应对萨赫勒的气候变化,尼日尔的国家举措和区域领导力正在产生积极影响。在国内,尼日尔采取了各种创新性政策、战略、计划和举措,以期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强人民的抗灾能力。例如,题为“尼日尔人养育尼日尔人”的里程碑式举措使尼日尔在遭受旱灾的情况下避免了饥荒。得益于这一举措,尼日尔自2011年以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到2012年已经成功地提前将本国受粮食不安全威胁的人口减少了50%。

在次区域层面,尼日尔积极参加各种气候行动。自1974年以来,尼日尔一直是负责萨赫勒地区天气预报和粮食安全的农业水文气象区域中心的所在地。此外,自2016年以来,尼日尔一直领导萨赫勒区域气候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由17个非洲国家组成,旨在推动在本次区域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最后,为使联合国更好地协助世界各国减少气候安全风险,我提议联合国在协助各国之前进行综合气候安全评估,协助建设从国家到地方的监测和管理气候变化效应的能力;责成与相关政府机构保持联系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收集关于冲突环境中气候方面安全风险影响的权威信息,并将这些结果提供给联合国会员国;确保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充分纳入气候方面的安全风险和管理,并适当考虑到性别平等问题;加强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响应天基信息平台,以便增加一个气候相关安全风险评估部门,供安全理事会使用;以及建立和维持一个联合国气候安全风险协调机制。

附件3

纽埃可持续太平洋咨询公司主任科拉尔·帕西西的发言

我感谢有此机会在本次高级别辩论会上向安理会通报情况。

十多年来，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每年都在其年度公报中指出，气候变化对本区域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但为节省时间起见，我今天只想强调三个例子。

第一，我们的海洋边界受到威胁，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所确立的既定海洋法律秩序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太平洋岛屿区域是一个蓝色大陆，98%为大自然中的海洋。我们的集体专属经济区面积为28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专属经济区20%以上。无论是从集体角度还是从个体角度看，我们各国的经济、环境、人民和安全都与我们的海洋密切相关，与我们现在和未来能够可持续地管理海洋资源并从中获益的确定性分不开。

《海洋法公约》为海洋建立了全面的法律秩序，提供了一个确定、稳定和持久地划定海域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和经济回报的制度。然而，《海洋法公约》并未预见到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因此，世界各国的许多海洋边界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属于受影响最严重者，原因有多个。第一，对于我们许多岛屿国家、特别是低洼环礁来说，用来划定海洋边界的基点包括珊瑚岛和沙质珊瑚礁。这些地貌易受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和珊瑚礁系统退化的影响。

此外，地球上多数低洼环礁国家位于太平洋区域。我们这些低洼环礁国家中的四个国家，其90%至100%的专属经济区是根据这些脆弱的基线特征划定的。这可能对太平洋国家的立国之本、民族认同、可持续发展、生计以及法律和秩序有着重大影响。最大的安全威胁莫过于整个国家及其依照国际法确立的管辖区可能消失。

鉴于这一安全挑战的严重性，太平洋领导人优先重视登记海洋边界登记，将此作为当务之急。最近，他们寻求采取前瞻性的法律办法，以确保一旦根据《海洋法公约》确定了海洋边界，就不可因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质疑这些边界。这是太平洋岛屿国家自己开展的高度技术性和资源密集型的工作。过去十年来，这项工作得到了一系列伙伴的协助，由太平洋共同体牵头，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提供支持，由澳大利亚和其他伙伴提供资助。

第二，蓝色经济受到威胁，特别是金枪鱼渔业预计会遭受损失。健康的海洋环境带来的渔业和旅游业收入支撑着我们多数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卫生健康。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很大一部分珊瑚礁、海洋生态系统以及我们所依赖的关键物种永久退化，破坏其稳定。鉴于时间有限，我愿着重举金枪鱼为例。

世界金枪鱼种群有一半以上位于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地区。全球金枪鱼供应有三分之一来自这个地区，若干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金枪鱼。有九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全部收入中平均有10%至84%来自金枪鱼捕捞许可证费。此行业雇约6%至8%的劳动力，而且妇女所占比

例往往较高。15年内,在太平洋岛屿居民粮食安全所需的全部鱼类供应中的25%将需要由金枪鱼提供。

气候变化预计会改变金枪鱼的洄游模式,使它们进一步向东移动,进入公海区域。气候变化还会影响鱼群健康和数量。

最新初步建模和进行之中的经济分析表明,按照典型浓度路径8.5的排放假想,到2050年,目前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专属经济区捕捞的金枪鱼总渔获量有20%将会转移到公海区域。这意味着,到2050年,所有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每年将损失9000万美元的捕捞准入收入,而且多国政府的总收入损失高达10%至15%。

这些效应还会削弱现有的守法和执法安排,增加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的可能性,因为在公海区域进行监测和实施处罚更加困难。如果不加处理,这些威胁的后果可能在这些岛国的经济中引发冲突和动荡。

第三,我们区域已经受到流离失所和被迫迁徙的威胁。由于海水侵入、海岸侵蚀和珊瑚礁退化,陆地正在消失于海洋之下之前,早就严重退化,成为不毛之地。若不采取雄心勃勃的缓解和适应措施,这可能会迫使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和迁往别处,并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破坏。我们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离海洋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流离失所已经在影响太平洋区域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社区。实例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有些居民从卡特雷特和其他环礁迁往布干维尔,以及在岛屿之间迁移——过去的大约十年中,气候变化导致民众从图瓦卢迁往纽埃。

这种变化损害复杂且往往有争议的传统土地保有制度和有限的土地资源,从而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变得更加脆弱。保护政策、资源以及关于本区域这些局势现状和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局势的信息仍然非常缺乏。国家、社区和个人将继续遭受经济和经济以外的巨大损失和破坏。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年轻人,注定会失去他们与生俱来的固有文化和传统习俗权利,可能还会失去公民权。这些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联合国系统和安理会能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

毫无疑问,我们为减少太平洋岛国和全世界所受威胁而能采取的最重要措施是阻止并扭转气候变化。这需要雄心勃勃地执行《巴黎协定》。

冠状病毒病虽然可恶,但是它为重置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凸显了健康、互联和有复原力的社会的重要性。没有集体气候行动,我们就无法在长期实现这些目标。重大气候事件或许可以被延后发生,但紧急气候事件不行。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所有人理解和监测全球所有人受到的影响,并愿意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

对于那些对全球变暖贡献很小但注定会遭受巨大损失的国家来说,让地球上负责全球安全的最高多边机构——安全理事会——花时间了解这种情况,并尽其所能处理这一问题,似乎是一个公平的要求。

我呼吁安理会继续在强化现有的最佳科学、模型和风险评估,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工作。我呼吁它与已经在发展、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实践领域开展的许多现有努力进行协调。我呼吁它调动必要的能力和资源,并利用其权威凝聚全球的雄心,在这个问题成为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应对的更大安全挑战之前解决它。

附件4

比利时副首相兼财政与发展合作大臣亚历山大·德克罗的发言

我们高兴地共同主办今天的会议，并感谢德国的倡议。我们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见面附件18）和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代表（见附件21）提交的发言。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富有洞见的意见。

今天的议题并不抽象，也不局限于安全理事会会议厅的虚拟墙壁。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越来越无常的降雨模式正在加剧萨赫勒地区牧民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干旱正在造成流离失所，影响着从索马里和也门到阿富汗各地的生计。受影响的社区变得更容易被叛乱分子招募，或是争夺更加稀缺的资源。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极地冰盖的融化正在导致北极的军事化。

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很少是直截了当的。它涉及多个方面，并取决于具体情况。气候变化强化了驱动冲突的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有些人可能认为，该议题因为其复杂性而不属于安理会议程。但复杂是不作为的借口吗？

《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十分明确。我们作为签署国，有义务“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过去75年来，我们太过关注眼前的危机。我们未能采取有力的预防行动。面对气候变化这个迄今最严重的生存挑战，我们联合国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告诉子孙后代，尽管我们心知肚明，尽管有大量研究，但我们仍未采取行动吗？

比利时作为当选成员，一贯支持安理会在应对气候所致安全风险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本次辩论会得到来自各大洲的广泛参与和安理会大多数成员的持续支持证明，这是一项广泛的共同努力。

我设想采取以下优先行动来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第一，安理会需要更好地了解情况。我们需要数据和更好的信息管理。分析和预测工具为预警系统提供信息，并提高预防冲突的能力。现有工具很少涉及气候变化。因此，联合国需要体制层面的一个信息交换所，即一个调集现有专门知识并将其提供给安全理事会的机构。在这方面，我们坚决支持气候安全机制，并为加强该机制作出了贡献。在这方面，比利时欢迎启动一个非正式专家组，使安理会对该议题的参与进一步制度化。

第二，联合国需要报告。更强大的信息基础应该促成秘书长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气候方面的风险和预防措施。这将使我们更好地共同理解哪些区域和部门受影响最大。我们还期望国家一级的定期报告具有气候敏感度，并鼓励秘书处组织气候方面的前景展望通报会。

最后，安全理事会需要行动。在我们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比利时的首要重点是将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安理会相关行动的主流。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目前有12项国家、区域或专题任务授权可以被视为有气候敏感度。这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非、苏丹和马里。我们期望这些特派团在人员和培训方面具备专门能力，并支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努力。我们还期望联合国特派团注意自身的环境影响。

我们也倡导安理会之外的行动。比利时每年自豪地向全球环境基金捐助1500万欧元，并于最近宣布将在2020-2023年期间将我国对绿色气候基金的

捐款翻番, 达到1亿欧元。在过去四年中, 比利时每年还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捐助约1500万欧元。此外, 比利时开发机构援外署的72%的活动在脆弱环境中开展。然而,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 当前10个最脆弱的国家仅获得4.5%的气候资金。冲突和危机的预警系统很少包括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为了弥补我们在理解和承诺方面的这些差距, 我们还启动一项对比利时在中部非洲地区发展援助的多层面学术分析。

越来越多国家正在经历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和人道影响。这种前景让后代感到害怕。安理会曾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主持下, 举行过一次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辩论会。不同寻常的是, 比利时的发言是由青年代表撰写的。气候和安全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这不足为奇。

今世后代期待我们采取强有力的一致行动。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们。

附件5

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的重要公开辩论会。

我还要感谢助理秘书长延怡和其他通报人的见解和建议。

越南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的湄公河三角洲——它对越南和区域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是受海平面上升和盐碱化影响最大的三角洲之一。因此，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越南认真履行我们在所有气候变化相关重要国际法律文书下的承诺和义务。我们支持努力应对气候相关挑战，包括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努力。在区域层面，我们与合作伙伴合作，增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认识、协调和抵御能力，执行《东盟应对气候变化联合措施》。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它们剥夺了人们的生计，造成其粮食和供水供应严重缺乏保障。它们导致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并引发了对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事实证明，气候变化会使危险的威胁成倍增加，加剧脆弱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并延长、加剧甚至引发冲突和不稳。

面对这些巨大挑战，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自身作用。越南积极参与的、目的是在安理会推动气候议程的持续努力正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是还可以做更多工作。

首先，安理会应继续采取综合和全面的做法来处理冲突根源，例如贫困、不公正、穷兵黩武和无视国际法。

第二，安理会应在冲突分析中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要想制定能够全面、可持续地解决危机和冲突所涉各方面问题的战略，这一点具有关键意义。

第三，安理会必须支持整个联合国系统作出努力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国际文书发挥作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必须继续以减轻、适应和抵御力为基础，指导国家和全球对策，这将有助于预防气候导致的冲突和危机。应特别注意和协助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内陆国家，其中许多国家遭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但在应对能力、专门知识和资源方面远远落后。

第四，安理会在处理气候与安全问题时，与任何其他国际机构一样，需要尊重国家主权、本国当家做主和承担主要责任的原则，各司其职。

除非我们更加有效地协调努力，否则气候变化不分国界，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为了应对这一全球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球对策，其中联合国协调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我坚信，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对于确保我们的人民和地球可持续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

附件6

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的发言

作为外交官和政治人物，我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谈判。这也是成立安全理事会的基本思想：建立国际共识。但是我们无法与自然谈判。全球变暖在物理、化学和地理方面都有表现，现实不会同我们搞妥协。

从萨赫勒地区到太平洋和加勒比岛屿，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已对和平与安全产生确实实的影响。气候变化很快就会成为我们正在处理的几乎每一场冲突的催化剂。今天，我们的通报者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我们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最终迎难而上。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他们希望我们采取行动，子孙后代也希望我们采取行动。今天，我们要提出可以立即采取的三个步骤。

首先，安全理事会需要在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方面了解更多情况。这应该包括预警指标，使我们能够在为时不晚的时候采取行动。在上个月于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启动了《全球气候安全风险和展望评估》。它可以成为我们在安理会工作的参考点，也可以作为加强联合国整体调解和预防性外交工作的工具。这将需要在联合国特派团和调解小组内提供更好的培训和专门知识。例如，德国资助了一位专家，该专家就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向索马里国家工作队提供建议。这应成为联合国所有行动的标准做法。

其次，现在应该有人负责气候与安全问题。我们呼吁秘书长尽快任命气候与安全特别代表。他或她可以确保将气候变化摆在应有的位置，也即安全理事会维护21世纪国际和平与安全这项工作的核心位置。

第三，联合国需要做好准备，在出现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时采取行动。因此，必须在所有任务授权和预防冲突战略中处理此类风险。我们将与伙伴们一道，尽快召集安全理事会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主题永久纳入安理会的工作。

今天，我邀请所有与会者与我们一道开展这一努力。我感谢并相信，接替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国家会推动我们的联合倡议。应对气候变化不应使我们分裂。我们遏制气候变化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世界各地因气候变化而已在遭受暴力和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承受不起等待。

因此，已经没有耐心开展外交的时间了。安全理事会无法与大自然的现实谈判。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附件7

爱沙尼亚环境部长雷内·高克的发言

我感谢通报人的详细报告。

仍在持续的冠状病毒病疫情给全球许多地方提出了挑战。它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协调,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带来的安全风险。

人之所以感到不安全,原因几乎从来不只是一个,而是有各种因素。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加剧了动荡和现有的紧张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现在就存在这些风险。

爱沙尼亚不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的高发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遭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农业和林业部门。但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影响远远不止这些。

显然,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正在加大。这就是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原因。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严重程度被低估。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加剧了冲突和脆弱的重要动因,使国家和社会稳定面临困难。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系统性做法,处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

首先,应当提高联合国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的能力。例如,任命气候与安全特别代表将有助于改善联合国有关实体之间的协调。

其次,我们需要可靠、准确的信息和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冲突动因及其对稳定的影响。我们需要改善数据收集、监视和分析工作。秘书长就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系统报告应成为这种做法的一部分。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争夺,减缓气候变化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必须投资于绿色和可持续的技术。爱沙尼亚正在努力开发氢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这些绿色解决方案是稳定、和平的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邀请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与爱沙尼亚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并分享最佳做法。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应该成为安理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预防工具和战略上,而不是事后处理后果。

尽量减少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和防止冲突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不采取相关行动,气候变化将会增加脆弱性、削弱和平和安全。

附件8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大臣、温布尔登的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的发言

我总是很高兴看到马斯外长并和他一起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们感谢通报情况的专家——马加吉先生、延恰助理秘书长和帕西西女士——今天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富有洞见的专业通报。

今天繁荣面临的威胁会成为明天的地缘政治问题，通报者就此明确阐述了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联合国自2007年首次将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以来（见S/PV.5663和S/PV.5663 resumption），一直将其放在安理会议程的重要位置。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说的是对的，自那以来也有许多其他人强调了这一点。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中的五大全球风险都是环境风险，这还是史上头一回。

显然，气候变化导致压力和困难倍增。它对世界各地最脆弱国家和地区的最脆弱社区打击最大。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资源稀缺、经济冲击、流离失所和海平面上升导致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加上我们今年都经历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这个倍增因素，和平面临的威胁变得极为严重。

我们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平等。例如，我们知道，妇女和女童遭受的痛苦格外严重。性别不平等可能会限制获得教育、决策、食物和适足住房的机会。女童和妇女可能更容易遭受灾害引发的贫穷或剥削。妇女在气候相关灾难中死亡的可能性比男子大得多。并且我们知道，性别暴力和性剥削在危机期间有所增加，这很可悲却是事实。灾难过后，妇女和女童在尝试获得粮食和其他基本需求时，经常遭受性暴力和性剥削。上周，我和主席一起重点讨论了这些具体问题。我要再次强调并重申，联合王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包括通过“在冲突中防止性暴力”倡议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处理气候安全问题的做法必须对这些不平等和深层关切保持敏感。妇女的充分、有效、重要和切实参与是可持续和平的关键。这一点有据可查。我们必须以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和优先事项为导向，在制定对策时必须利用她们的潜力、见解、专长和经验。安全理事会必须借此机会消除这种不平衡。

当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每个国家都必须决定如何适应气候影响、如何提高抵御能力。

作为明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的核心优先事项，联合王国希望召集各国，根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目标和《框架公约》的目标，紧急增加气候行动。在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上，我们将优先考虑建设适应力和抵御力的行动，特别是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包括通过加强协调和增加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建设抵御力，我们可以降低风险，包括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

此外，正如54个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在最近关于COVID-19疫情的声明中共同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开展集体协作，以便恢复得比原来更好。这包括继续为小国和脆弱国家代言，承认疫情加剧了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的许多固有挑战。共同努力对我们每个国家都有好处。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证据的办法来应对气候安全威胁。有了这样一个办法, 我们就可以针对议程上的脆弱和冲突国家制定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在安全理事会的几项决议中这样做了, 特别是最近关于马里、达尔富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索马里的决议。我们现在必须推动有效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必须将气候适应能力纳入我们的发展、建设和和平和人道主义工作。我们必须使用数据、证据, 采取最佳做法。为了有效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理解冲突驱动因素及其对长期稳定的影响。我谨响应呼吁, 要求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关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全面报告。

第二, 我们也欢迎将气候风险评估和气候适应能力作为安理会工作的一部分。这将把气候风险正确地纳入联合国行动、冲突预防和解决战略以及建设和平基金。我们将通过风险指引型早期行动伙伴关系, 扩大早期行动融资, 改善预警系统, 建设早期应对风险的国家能力。我们正在支持制定一项重新执行计划, 这项计划到2025年将使大约10亿人免遭灾难。

第三, 我们将支持加强联合国的能力, 使气候风险分析和相关行动成为一种基本工作方式。

最后, 我们将把气候预测与更广泛的预防冲突措施结合起来, 使我们的努力不偏离目标。

最后, 毫无疑问, 正如主席本人所阐述的那样, 气候导致的安全威胁是真实的。它们迫在眉睫, 不会消失。因此,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才能使联合国系统在我们做决定时整体考虑气候风险和威胁, 并将其纳入联合国特派团的规划。

附件9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的发言

主席先生,欢迎你主持此次会议,感谢延恰助理秘书长、马加吉上校的通报。我也认真听取了帕西西女士的发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阻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再次提醒我们,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是化解风险挑战的最有力武器。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前途命运,更需要我们共同携手应对。中方愿提出几点倡议:

一是恪守承诺,切实落实气候变化多边共识。各国应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摒弃以自我为中心和本国优先,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气候变化多边进程面临最大问题是气候融资严重不足。发达国家应兑现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承诺,并提出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提高资金支持透明度。

二是发展优先,加速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发展问题,而非安全问题,两者没有直接联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要靠推进可持续发展。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好了,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加剧的安全风险都能迎刃而解。国际社会应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优先位置。各国要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三是以人为本,确保不让任何人和国家掉队。国际社会应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差异,帮助其应对特殊困难和挑战。非洲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不足、资源匮乏、技术薄弱等困难。发达国家应积极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民众提升适应和减缓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各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时,应优先解决脆弱人群困难,改善民生福祉。

四是统筹协调,推动联合国机构各司其职,汇聚更大合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联合国发展系统及驻地协调员等应根据各自授权,结合有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动员各方力量,有针对性提供支持。安理会作为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机构,应落实有关决议要求,全面分析当事国面临的具体安全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加剧的安全影响,在国别议题下讨论和处理相关问题。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始终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认真履行《巴黎协定》。我们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改善人民福祉和生活质量作为奋斗目标,着力解决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2018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累计下降45.8%,提前两年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4.3%。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装机、发电和消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世界一半以上。

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建设美丽中国。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

一来自中国。2020年,中国将力争全国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今年是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胜之年,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空气质量成果显著,中国人民享有的蓝天越来越多。

我们积极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帮助沿线国家建设水电、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有力推动各国能源转型,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建设低碳示范区、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中方还推动二十国集团发表首个气候变化主席声明,连续两年举办中国、法国和联合国三方高级别会议并发表公报,为国际社会作出表率。作为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共同牵头方,中方推动该领域达成近200项倡议,引导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环顾世界,个别国家不负责任、疯狂至极的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正产生越来越危害。如任其发展,国际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互信将荡然无存,世界将永无宁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予以有力反击。我愿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站在多边主义一边,站在国际正义一边,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反对唯我独尊和强权政治,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附件10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安全理事会特使何塞·辛格·魏辛格的发言

我们感谢德国召开本次我国欣然参与发起的辩论会。

多米尼加共和国赞同瑙鲁代表团以“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提交的发言(见附件21)。

安全理事会分别在2018年瑞典(见S/PV.8307)、2019年多米尼加共和国(见S/PV.8451)以及现在德国担任主席期间,连续三年就这一问题举行辩论会,这并非偶然。我们去年4月举行的“阿里亚办法”会议,是2013年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五次“阿里亚办法”会议。这表明,人们对气候变化会给和平与安全带来风险或其影响会加剧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风险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于许多像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构成危及生存的风险。它对我们各国人民的发展和福祉的影响已得到广泛承认。在加勒比区域,鉴于极端自然现象的频率和强度增加,我们各国领土以及在那里建设未来的人们无疑十分脆弱。

但是,气候变化是一个多方面的挑战,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它带来的风险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活 and 生计。我们看到,通过共同努力,在将气候变化的影响视为乍得湖区域、马里、索马里、西非和萨赫勒、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局势中的风险因素之一这件事上取得了进展。今年,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以及安理会有关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文件均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

此外,我们还在确认气候变化的影响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本机构的其他关切——如从性别角度处理冲突等关切——之间存在关联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在分析冲突对青年、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如老人、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影响时,必须继续纳入气候视角,这一点至关重要。

现有证据表明,未来几年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加剧。因此,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转化为冲突根源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本机构负责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提高自身分析能力,整合各种必要工具,以查明破坏稳定的因素,并最终防患于未然。我们岂能无视自然灾害——旱灾和水灾、土地退化及海平面上升——的后果及其与潜在和当前冲突的关系,如贫困、对稀缺的自然和粮食资源的争夺、流离失所以及社会紧张局势?

我们赞赏由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署主持的气候与安全机制已做出的努力。它们对设计评估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概念框架的贡献以及用于制定预警战略及预防和管理风险的工具至关重要。

现在,面对各种非常规威胁,我们必须继续反思预防冲突工作,并在已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必须从救急应付转向综合施策,将气候安全风险纳入我们的审议工作,并由秘书长提出更多有系统、有针对性的报告。要纳入这一信息,就必须加强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的分析能力,并因此增加实地行为体的能力和培训,以便能够查明和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因为气候变化与其他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需要继续致力于制定必要的任务授权,确保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一议题定期出现在安理会议程上。安理会具有独特的作

用, 必须应对我们已经确定的挑战。现在是齐心协力的时候, 安理会应显示政治意愿, 采取坚定行动, 使我们能够作出适当和一致的反应。

附件11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首先,我谨赞扬德国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视为其在安全理事会任期内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我还要赞扬延恰先生及其后各位发言者所作的通报。

在应对由冠状病毒病造成的全球卫生危机的行动正在引起所有人关注的时候,重要的是,不应忘记环境风险、特别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生物群毁灭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并加强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集体行动。像我们这样处于气候紧急状态的世界,是一个面临更多安全风险和新威胁的濒危世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来预测、防止和限制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愿与安理会分享三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崩溃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必须立即成为预防冲突议程的一个关键要素。第二点看法是,对这些风险定期进行严格分析是必要的,符合国际公共利益;联合国在这方面必须发挥核心作用。第三点看法是,在进行这一风险分析的同时,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发展伙伴和联合国机构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基于这些信念,法国愿就我们已经提出的若干建议,包括以下两项主要建议,与所有会员国合作。

第一项建议旨在采用一个集体工具,分析和预警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一些数据和分析工具已经存在,但它们分散在各国中间,甚至在联合国内部、在其各机构之间,以及在各智囊团中。必须把它们集合在一项文件中,并赋予它们高度可见性。缺少的是一个发出警告的人,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那样为气候变化发出警告。法国希望秘书长扮演这一角色,每两年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对世界所有区域气候变化的影响给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及时作出各种预测。唯有如此,才能对萨赫勒、亚洲部分地区和岛屿国家目前面临的威胁作出真正适当的反应。也唯有如此,才能预见未来威胁并帮助最脆弱国家应付它们在未来数十年将面临的压力。

第二项建议涉及联合国在提出具体行动建议方面发挥的作用。面对这些安全风险,我们必须调动各种工具,并加强秘书处有关气候专门知识和协调能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在极端天气事件之后,需要采取紧急人道主义措施,以拯救生命和确保安全,并为重建提供手段。在另一些情况下,需要帮助社区适应不可避免的海平面上升和土壤退化。有时需要未雨绸缪,为小生产者提供保险机制,使他们能够在气候灾难之后迅速重启经济活动,而不是必须迁往别处。在此框架内,气候与安全机制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但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特别是为此任命一名气候安全特使。

无论如何,联合国都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提出这些建议,然后协调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国际伙伴必须优先作出的努力。

面对这些确定的风险,我们不可心存侥幸,予以否认或相信虚假信息。我们可以预测和应对这些风险,并预防冲突。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这是联合国和安理会的职责,也是法国的承诺。正因为此,我们支持向大会提交一项旨在落实今天所提出建议的决议草案的想法。

附件12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的发言

马斯部长,我谨欢迎你以及来自越南、比利时、爱沙尼亚、联合王国和突尼斯的尊敬的各位部长和大使参加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颇有见地的介绍。

在全球各地,我们正越来越多地目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为气候变化影响到人、生态系统和生计。在这些影响中,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和干旱正在造成粮食不安全、生境丧失和物种灭绝。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说,随着时间推移,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增加。

在此背景下,我愿就本次公开辩论会的议题,即气候与安全,概述三点意见。

第一,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的联系在不同情况下有很大差别。我感谢 Mahamadou Seydou Magagi 先生以萨赫勒为例,使本次讨论具体化。

虽然气候变化从来不是冲突的唯一驱动因素,但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使已知会造成不安全状况的现有风险倍增。然而,这一联系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是否有经费和适应能力。因此,必须通过考虑到当地情况和最新气候信息的知情分析来理解这一关系。

我同延恰助理秘书长一样认为,我们必须以人为本,并从处理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的日常经验中学习。只有理解气候与冲突的确切关系,我们才能提出有效和高效的政策建议。安全理事会在各次会议上讨论了气候与安全问题。安理会还把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了针对具体国家的决议。在这方面,注意加强受影响国家适应和缓解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影响的能力也很重要。

还建立了气候安全机制,以评估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及其管理战略。加强这一机制,包括通过能力建设和与国际研究界的联系,是有益的。

第二,我们应该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整个和平进程的主流,从预防冲突、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冲突后恢复,并应逐案处理。这包括将气候分析纳入风险评估,考虑气候对和平进程和维持和平行动的影响,以及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设计有气候敏感度的建设和平干预措施。将气候问题纳入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可有助于防止气候变化的影响引发和升级冲突。

必须优先关注气候风险与脆弱政局交织的国家和局势。至关重要的是,要根据这些国家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帮助它们建设适应能力和增强复原力。

第三,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联合国系统必须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任务授权协同工作。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安全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因此任何行为体要单独制定对策既无可能,也不现实。必须加强所有联合国实体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以确保有效的应对战略。应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努力应利用和调动现有的专门知识和能力,并考虑到各个受影响社区的需求。

最后,如果说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给了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仅照顾国家利益无法解决共同的全球挑战。因此,我要重申,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加强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为此,印度尼西亚认为,关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讨论和审议

只有最终带来行动, 通过强有力的缓解和适应行动, 适当应对气候变化, 才能有所裨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平台, 维护《巴黎协定》以及各国履行本国确定的承诺仍然至关重要。就我国而言, 印度尼西亚已准备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作出贡献, 包括处理气候变化与安全挑战的关系。

附件1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代表因加·罗恩塔·金的发言

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多层面和跨领域的现实,是一种生存威胁。干旱、荒漠化、降雨量不稳定、海平面上升、洪水、飓风和其他气候灾害危及生命和生计,加剧了流离失所和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这对各国的影响已经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解决这场危机,它只会更加严重。我们需要领导力和政治意愿来彻底改变我们地球的轨迹,应对已经存在的气候和安全挑战。为此,安全理事会显然必须在其任务范围内努力应对气候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将成为向正确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并赞扬德国召集我们讨论这一共同威胁。我们很高兴成为这次会议的共同主办方。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富有洞见的发言,这有助于强调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致力于在安全理事会内外应对这一生存威胁。

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些局势,从海地和阿富汗到西非和萨赫勒地区,提供了明确证据,表明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已对安全产生切实影响,并造成许多挑战。安全理事会在越来越多局势中确认了这一问题,但由于缺乏集体政治意愿,我们遗憾地未能在安理会产生的众多决议中纳入气候和安全考虑。这意味着,具有气候敏感度的必要评估和专门知识往往没有被纳入许多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的关键行动。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认为,必须使安全理事会能够进一步提高认识、理解和能力,以循证方式评估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安全影响。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但是,我们都必须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文书,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将气候视角全面纳入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支柱至关重要。因此,需要的是一种互补、协同的方法,最妥善地利用所有相关机构和行为体的专门知识。

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来自具体国家和区域局势的充分数据,同时考虑到与气候相关风险的差别性影响和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提高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因此,我们鼓励将这种气候安全评估纳入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所有已获授权的局势报告。我们还提倡任命一名气候与安全问题的特别代表,以协调联合国系统所有支柱的应对努力,并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促进全面行动。

主席先生,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无法与自然谈判。这需要制度和行为的改变。随着全球死亡人数上升,破坏日益严重,必须消除问题根源。因此,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需要历史上的排放大国——也可称之为超级排放国——承担责任,承诺遵守《巴黎协定》的条款,并采取必要行动将气温上升保持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此外,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气候融资承诺,将其作为底线而非上限。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会之窗关闭、来之不易的安全成果前功尽弃之前,气候融资对于受影响国家的紧急适应和缓解需求至关重要。是的,现在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附件14

南非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克索利萨·马布洪霍的发言

我们感谢助理秘书长和各位发言人对这一问题的贡献。

即便是在当前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南非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对气候变化这一事关生存的挑战作出集体、多边回应，我们正在非洲大陆和国家层面上再次加倍努力应对这场危机。

南非认识到，人们认为极端天气事件、干旱、缺水、粮食不安全和荒漠化因气候变化而加剧，它们有可能增加主权国家内部或国家间暴力冲突的风险。在非洲，有一些证据表明，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部分地区以及非洲之角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具体情况中，气候变化是一种威胁或风险倍增器，通过给本已稀缺的资源带来压力，加剧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尽管存在这些情况，但目前几乎没有科学证据支持气候变化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一更普遍的结论。因此，南非仍然对于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专题问题引入安全理事会，或在这个论坛上作出一般性决定持谨慎态度。相反，在我们认为气候变化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明确诱因的地方，安全理事会在可能受影响国家的具体背景下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是适当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能够作出的贡献也是有限和不明确的。因此，我们欢迎有机会听取安理会成员对于可以作出什么贡献的想法。必须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在致力于有效支持可持续发展所有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边机构的协助下，通过全面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来加以解决。

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确保国际合作，从而采取必要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并确保所有需要执行手段支持或在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方面需要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获得这种支持。就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而言，同样，最好的办法是向受影响国家提供大幅扩大、适当和能够使用的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支持，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拥有主要任务授权和能力来激励国际社会采取这类行动，特别是因为《气候公约》获得普遍加入，以协商一致方式运作，并坚持其原则，包括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我们认为，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专题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有可能冲淡《气候公约》的重要性，并分散对其重要工作的关注和投入资源。我们还认为，对于安全理事会何时和在何种科学基础上把气候变化作为某一冲突局势的诱因，以及安全理事会在将环境问题纳入其议程方面究竟在哪里划定界限，有理由提出问题。当然，气候变化只是若干具有潜在和平与安全影响的严重环境挑战之一，我们需要防止安理会的任务授权越界，或者安理会超越其自身资源和能力去处理问题。

我们不想淡化与气候相关的具体安全风险，安全理事会多年来在各种成果中逐步认知了这些风险，对这些风险的分析能力在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在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安全机制中得到了加强。相反，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最适合某一特定目的的联合国系统机构，有效输送其资源。不过，我们欢迎本次会议给我

们机会来探讨加强安全理事会能力, 以便更好地酌情应对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建议。

最后, 我们将一如既往, 敦促在与包括非洲联盟在内区域组织之间密切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考虑这些风险, 并敦促我们寻求通过创新、成本效益性好的手段来利用现有资源, 避免创造可能给本已捉襟见肘的行动造成巨大成本和额外负担的新机制。

附件15

伯利兹外交部长威尔弗雷莱德·埃尔林顿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发言。马斯部长，我谨感谢你亲自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并赞扬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安理会发挥领导作用。他们的工作证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够为我们时代紧迫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带来独特和宝贵的视角。

过去30年来，小岛屿国家联盟一直是气候问题最坚定的倡导者。在此期间，我们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推动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这些文书今天仍然是决定全球气候变化措施的主要国际论坛。

毫无疑问，我们在《巴黎协定》方面的集体努力已经渡过难关，但对于全球变暖，我们尚未如此。目前的模型证实，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可能超过3摄氏度至4摄氏度，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损失和损害增加的前景，其程度可能使我们的一些岛屿完全不适于居住。正因为如此，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计算也许是我们发展和安全的最相关指标。

好消息是，我们都可以选择对这种计算做些什么。在巴黎，我们都承诺把排放曲线扭转至1.5摄氏度。我们都承诺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并逐渐这样做，发达国家承诺发挥带头作用，履行其提供新的额外资金的义务。我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以保护最弱势群体为基准来衡量我们的雄心，因为我们相信公平和正义。

这些原则是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为之服务的持久目标的基础。这些目标驱动我们推进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它们是我们审议每一项行动——从发展到人权到和平与安全——的指南。

在安理会今天审议如何提高能力，把气候考虑因素纳入其工作的备选方案的时候，我谨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谈三点核心意见。

第一，至关重要，各成员国应重申，它们明确致力于维护《巴黎协定》，致力于采取大胆和果断行动来加强其中长期气候计划。小岛屿国家联盟将欢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通报其国家确定的2020年会费时进一步承诺实现宏伟目标。

第二，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给最弱势群体带来不加区别的后果，安理会应促进将适应作为一种预防模式，同时支持加强处理损失和损害的国际框架的迫切需要。

气候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以及相关的人道主义后果正在显现并加剧，原因是缺乏全面和强有力的机制来处理这些远远超出我们有限适应能力的风险。

第三，时不我待，而我们却迟迟未作出必要的体制反应。应当为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的机关提供信息和设备，以应对最坏的情况，同时尊重它们各自的作用和任务授权。

小岛屿国家联盟为改进安理会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其工作的办法提出了三项建议：应用现有最佳科学；提高联合国评估气候威胁的分析能

力；以及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协调，以便能够向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系统性的支助。这些建议特别重要，因为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部署的一些政治特派团驻在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影响的国家。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能力对于知情决策至关重要。

我们欢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旨在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的联合倡议，以及气候安全机制开发的工具箱。然而，我们认为仍有改进的余地，特别是在确保指导方针更加透明并以科学为依据方面。还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落实根据《巴黎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概述的联合国系统四个行动方面。还有必要加强气候安全机制，以便与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妇女、青年和土著群体，进行更好的协调，确保采取更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办法。

鉴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我谨向安理会提出最后一项建议。这场大流行病使可能加剧现有脆弱性和挑战的各种复杂风险，包括气候变化，暴露无遗。它彻底改变了全球风险格局，让我们应对其后果的准备严重不足。我们必须吸取经验教训，调整联合国系统，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国际研究表明，当前各种传染病中有75%源自动物。因此，我们呼吁停止可能造成生态系统自然秩序中断的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做法。我们谨强调，进行环境问责和保护自然传承对于人类和地球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鉴于这场全球流行病预计会造成多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收缩，小岛屿国家联盟成员重申必须促进减排和基于海洋的经济政策作为重振全球经济的手段。

最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体坚定呼吁紧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使COVID-19大流行病恢复和气候行动步调一致。我们为应对COVID-19而需要的复原力和全系统调整与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需要的复原力和全系统调整直接相关。此外，COVID-19提醒我们，人类健康与地球健康息息相关。

我们进一步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根据《巴黎协定》的目标和1.5°C途径，紧急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当代最大全球挑战。这一抱负一直是并且仍然是我们的红线，它得到了国际法的强化。我们还呼吁我们的发达国家伙伴调集必要的资源，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能有机会获得充足、可预测和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必须充分履行所作的承诺和所承担的义务，不论是依照《巴黎协定》还是依照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作出的承诺和承担的义务。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团结与合作、多边主义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以克服我们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在我们为确保地球和地球上的人有个更安全和更繁荣的未来而打这场战役时，我们请安理会所有成员以公平和公正之名，不要站在我们身后，而要站在我们身边。

附件16

爱尔兰外交和国防部长西蒙·柯文尼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过去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爱尔兰赞同欧洲联盟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发言(见附件18)。

正如秘书长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到2050年,不断加速的气候变化将造成营养不良、疾病、移民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到数亿人。不言而喻,这么多人的生活受到的如此深刻的干扰将会影响我们各国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冠状病毒病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看来注定会普遍加剧这一干扰。

科学是明确的。若不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全球气温将会继续上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限制进一步变暖,同时也要对这一不断变化的现实予以了解、加以防备和作出反应。

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真实的即期挑战,我们对此绝不可视而不见。这一联系正被纳入世界各地武装部队的规划,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正式承认这一现实。

气候变化本身不会引发冲突。然而,它会加剧社会、经济、人口和政治挑战。

萨赫勒地区不可预测的天气模式正在加剧冲突态势。海平面上升威胁到派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一些小岛屿国家的生存。

虽然风险因地而异,但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那就是最弱势者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气候变化负有的责任最小。因此,保护弱势民众和保障人权必须是我们对策的一部分。更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战略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气候和安全环境,并建立预警系统。

我们必须通过强化地方和区域机构来补充我们的全球努力。非洲联盟的工作表明,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应当设计以地方自主权为核心的气候干预和冲突解决机制,加强机构和建立共识论坛。

必须对联合国所有行动进行强有力的分析,使联合国工作有的放矢。我们呼吁秘书长按照2011年7月20日主席声明(S/PRST/2011/15)的要求,在其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纳入关于气候变化可能对安全产生的影响的背景信息。

把联合国系统不同要素聚集在一起,气候安全机制是一个重要开端。需要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我们支持任命一名气候与安全问题特别代表,此举会进一步强化这些努力。

在我们的维和工作中,我们绝不可忽视以下事实:不论任务授权如何,我们的维和人员往往都在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危机。我们支持充分执行外勤支助部的环境战略,以确保维和行动不会加剧当地民众承受的环境压力。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继续努力,在更大程度上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维和行动任务授权。

爱尔兰大力参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该议程与气候安全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关联。为确保气候正义,我们必须把妇女、青年和儿童的独特经历摆在分析、应对和建设和平努力的核心位置。建设和平委员会完全可

以与安全理事会合作,在冲突国家和冲突后重建努力中纳入气候适应能力视角。

最后,所有联合国机构都可以在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作用,这方面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

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自身作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和平与安全挑战——目前无疑存在这些挑战——并团结整个联合国系统。我欢迎宣布成立安全理事会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

本次辩论会是这一进程中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作为选举产生的、即将上任的安全理事会成员,爱尔兰将努力在该议程上推动更多进展。

附件17

肯尼亚外交部长蕾切尔·奥马莫的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阁下的友好发言,并感谢他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们也向通报者和共同发起本次重要会议的所有国家表示感谢。

正在讨论的议题对我国肯尼亚来说非常重要。如安理会所知,肯尼亚是全球南方唯一的联合国总部,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人居署所在地。因此,我们继续呼吁分配更多资源,逐步整合内罗毕办事处的职能,以便其高效完成任务,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是对我们大多数国家的生存性威胁,我们普遍同意这一点。它已经在对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不仅本身是一种风险,也导致冲突、不安全和国家脆弱性风险倍增。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使情况变得更糟。它加剧水资源短缺和粮食不安全,导致发病率上升,并导致族群间为争夺资源而起冲突。此外,它还导致族群被迫迁移和非洲许多地区无序城市化。

这在非洲之角相当明显,那里许多国家正面临极端气候事件、冠状病毒病、恐怖主义和过去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气候变化使得国家能力捉襟见肘。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尽管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全球正在变暖,我们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却一直受到质疑并面临倒退,这使我们很难逐步转向对拯救地球至关重要的低碳道路。老生常谈是不够的。强调不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空谈的场所转向真正具体行动的舞台。在这方面,我们谨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必须广泛接受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在国际大家庭中就此达成一致并非总是易事。

第二,必须作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关键的相关国际文书就是例证,我们都必须努力批准这些文书,其中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说到做到。

第三,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强大授权的机构。在此,我们要强调环境署和人居署在内罗毕的作用。

第四,各国必须在国家一级展示承诺。在这方面,我自豪地说,在肯尼亚,我们制定了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框架以及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以便将气候行动纳入我们发展规划进程的主流。

第五,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应对气候变化与推动发展之间的联系。在肯尼亚,我们正在试图调整发展议程,推广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的理念。肯尼亚是绿色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并承诺到2020年种植20亿棵树苗,以恢复150万公顷已经退化和被砍伐的土地。

还可以做更多工作来推动安全理事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改进预警和预测系统,这将使我们能够确定和绘制气候变化热点,以便获得可核查的重要数据,从而促进在安全理事会进行决策和预防冲突。

我们清楚,如果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它必须有事实和数据。为此需要更好地利用地球观测技术和科学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编写出色的气候风险和展望评估报告,我们认为这份报告是由科学驱动的。

但是,我们即使在呼吁会员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机构、私营部门研究机构 and 社区本身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多合作时,也必须记住,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使发展中世界掉队。因此,必须有资金和培训来加强发展中国家在科学领域的参与。不仅如此,也必须实现关键数据获取的民主化,并推动该领域实现更多数据共享。

此外,我们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机构等区域和大陆机构之间的联系,这些机构拥有预警机制,能够向安理会提供及时的信息和分析,以实现我们所需的转变。

我们绝不能忘记,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地方性的,通常基于社区,涉及个人。因此,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必须从地方角度进行思考,在全球一级采取行动。

我们也希望鼓励安理会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决议。我们开始看到这方面的进展。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关于乍得湖流域的第2349(2017)号决议,该决议承认生态变化与冲突之间的联系。

只有联合国采取主动行动,重组支撑维和行动与和平支助特派团的价值体系,我们才能看到在处理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的联系方面开展真正的实地行动和真正的合作。

我们还必须重新思考和平支助任务,并且重新考虑人道主义行动。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培训我们的维和人员,以便与国家利益攸关方合作,迎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高环境恢复能力,建设我们社区的复原力,收集数据并监测环境变化,并将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纳入国家稳定和重建工作。如果我们想重建得更好,或许我们需要在绿色经济平台上重建弱国。

此外,让我们不要忘记妇女和年轻妇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关键行为者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非洲并且了解妇女的力量和气候变化对妇女的巨大影响的人来说,必须把妇女、和平、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置于安全理事会思考问题的中心。例如,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女性维和人员必须着手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以便我们能够真正评估气候变化和冲突对妇女的影响。

最后,我们愿强调,安全理事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障者,能够提供政治意愿、领导能力和勇气,帮助我们迎头直上,应对气候变化风险。

我国肯尼亚将作为2021-2022年期间当选成员加入安全理事会。我们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将致力于推进环境和气候变化议程,我们期待着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合作。

附件18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比约恩·奥洛夫·斯科格的发言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感谢安全理事会的10个成员，它们共同组织了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重要和及时的公开辩论会。

候选国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以及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赞同这一发言。

从气候的角度来看，本次会议是及时的，因为世界气象组织的新数据显示，未来五年中，每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比工业化前水平至少高1摄氏度。我们接近1.5°临界点的速度太快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报告《全球升温1.5摄氏度》中清楚地表明，这种气温上升可能对世界许多地区人民的生计和生活造成毁灭性影响。

在当前大流行病的背景下举行本次会议也是及时的，因为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继续无情地打击世界各国，暴露并加剧已经存在的脆弱性，同时加剧气候变化对粮食和水安全、生计、社会凝聚力以及安全的影响。这有可能破坏发展成果和人权，加剧暴力并破坏脆弱的和平进程。

我们在抗击这一流行病的同时决不能失去解决全球危机的雄心壮志，也不能对已经出现的后果视而不见。这突出表明，必须创造条件，使安全理事会能够更系统和更有效地处理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

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了重要的进展。秘书处气候安全机制的工作改善了安全理事会关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工作的分析基础。应进一步加强该机制，因为它汇集了联合国系统各部门的专长：预防冲突和调解、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气候变化、复原力和性别平等。我们呼吁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定期和系统的报告，以便扩大分析基础和行动建议，包括加强实地特派团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其预防和应对行动的能力。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把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其对国家和区域一级冲突的审议。

同样，必须使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能够应对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包括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带来的风险。在这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压力增加尤其相关，因为这增加冲突的风险，破坏建设和平的努力。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对安全的影响也是如此。为了采取有效的综合应对措施，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支柱必须按照相互关连的方法，在各级更加紧密地合作。

我们还必须继续关注性别层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妇女署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性别不平等、气候脆弱性和国家脆弱性在许多方面相互关联。在其中一个领域分值较高的国家往往在另外两个领域得分也较高。秘书长在其2019年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S/2019/800)中宣布，急需进行更好的分析，并立即采取具体行动来解决这些相互关联性。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应继续让青年人参与关于气候和安全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他们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

欧洲联盟(欧盟)仍然坚定地决心履行我们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下作出的承诺，包括通过欧盟绿色协议来这样做。我们呼吁所有伙伴在通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道路上展现同样的

决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气候捐助方, 我们的大部分帮助旨在把全球变暖适应和干预措施结合起来, 通过预防冲突来改善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我举我们提供支持的两个非常不同的例子。第一个是哥白尼卫星, 它的成像既可以用于对极端天气事件灾难(如最近加勒比海的飓风)的即时拯救生命应对行动, 也可以作为对威胁沿海社区生计甚至生存的气候影响预警机制。第二个是欧盟多年来对非洲主导的绿色长城倡议的支持, 该倡议旨在恢复退化的地貌, 解决气候变化关切, 并改变世界最贫穷地区之一萨赫勒地区数百万人的生活。

总之, 就像COVID-19的影响一样, 气候变化的影响威胁我们所有人。就像大流行病一样,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巨大的全球努力、共同的雄心和团结。我们需要整个联合国系统有能力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层面。让我们共同努力, 确保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所有部门拥有适当完成任务所需的所有资源。

附件19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丁·比尔·赫尔曼的发言

我很高兴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提交发言。

我们欢迎今天有机会讨论如何最好地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有关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全面和权威信息，并愿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继续授权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考虑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这应包括将气候视角纳入调解努力和预防性外交。

此外，我们认为，极有必要授权秘书长就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定期提交全面报告。这可以为会员国和秘书处提供重要的对话平台。在这方面，应当对其他现有进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结论加以利用。

我们欢迎气候安全机制为摸清联合国现有的分析工具、数据和方法所做的努力，并鼓励采取进一步行动，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包括建设和平在内的联合国各项工作的主流。我们还鼓励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

为了使联合国能够防止冲突升级，及时评估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至关重要，而各种伙伴关系可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和平行动必须以包容的方式与当地社区和当局协作，这一点至关重要。若要有效分析政策，并确保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制定符合当地需求和关切，包括边缘化群体、民间社会、土著人民、妇女和青年的需求和关切，当地知识和专长不可或缺。

其次，安全理事会与和平行动均应该与能够开展跨界活动的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协作，这一点十分重要。主要伙伴包括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次区域气候中心。

第三，和平行动必须在国家一级与安全部门和非传统安全行为体协作，共同编写此类风险评估，这一点也至关重要。其中应包括世界气象组织和国家气象水文机构的气候专家。

在上述基础上，联合国应开发多灾种预警系统，此类系统既要考虑到气候和安全风险，又要顾及跨支柱综合对策。为此，我们提议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和管理纳入领导能力评价框架以及驻地协调员和特派团领导层的报告责任。我们还提议在人道主义界建立的现有预警机制的基础上规划联合国和平行动。

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都密切相关。妇女往往因气候相关安全风险而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但她们也可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成为促成变革的关键力量。建设和平努力应利用这些机会，加强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并增强其经济权能。今天的青年会在未来面临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将青年纳入涉及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决策过程。

最后，我们谨重申，看到气候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得到全理事会的更多关注，令人欣慰。我们期待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更多对话，以确保安理会及时获得有关气候所致安全风险的足够信息。

附件20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萨蒂延德拉·普拉萨德的发言

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德国邀请我谈谈当今时代的巨大挑战：气候危机对安全的切实影响以及需要采取的全球对策。因此，我代表斐济总理兼土著事务和糖业部长乔萨亚·沃伦盖·姆拜尼马拉马先生提交以下发言。

斐济极为密切地关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直接参与或支持世界各地的和平行动。我国勇敢的维和人员从我们参与的许多和平行动中了解到，联合国正在为面临巨大气候压力的区域的和平行动投入越来越多的努力和资金。这并非偶然。

问一问世界各地任何一名实地斐济维和人员，他或她都会说，缺水、干旱、飓风、荒漠化等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的自然现象加剧冲突。这些现象加剧对资源的争夺。它们对心灰意冷的青年的激进化推波助澜，使激进意识形态变得更有吸引力，传播得更广。它们使冲突变得更加旷日持久，更加难以实现政治解决。

斐济的观点是一贯的。气候危机危及国家内部的和平与稳定，并日益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安全状况。对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是一个危及生存的危机。它对我们所有经济体的影响都是深刻而久远的。它破坏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影响粮食安全，在我们各国的民众当中造成深深的焦虑。它还威胁到我们在本区域一贯所感受到的和平与安全感。

斐济和所有太平洋岛屿领导人都向国际社会指出，海平面上升绝不能对我们海洋国家的海洋边界产生影响。海平面上升并非由我们造成，这一现象绝不能威胁、侵蚀或限制我们的国家主权。

作为大洋国家，我们依靠海洋谋生。然而，海洋不断变暖，促使洄游鱼类种群从我们专属经济区大规模迁往东太平洋较冷的水域。仅此一种情况给太平洋岛屿造成的损失每年就超过10亿美元，几乎是每年向太平洋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两倍。这对这些岛国的小型经济体及其稳定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这一威胁还在加剧。

当安全理事会把大量精力花在长期的地缘政治挫折上时，我们正面临一场在整个太平洋不断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危机。对我的同事、瓦努阿图总理鲍勃·拉夫曼阁下说一下试试，安全理事会会不会迅速应对气候危机。他的国家正处于从超级飓风“帕姆”的袭击中恢复的漫长过程中，这场飓风在2015年摧毁了瓦努阿图70%的经济。今年早些时候，瓦努阿图遭到超级飓风“哈罗德”的袭击，30%的经济被卷走。现在，因为冠状病毒病（COVID-19），瓦努阿图面临经济支柱、即旅游业几乎完全崩溃的问题。

瓦努阿图和斐济都是国际社会有贡献的成员，我们希望看到人们为世界上的动荡之地带去解决方案。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指出：请勿把气候问题置于次要位置。

我们拥有赢得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所需的工具和框架。现在，国际社会要问，我们是否拥有体制架构和意愿。斐济和太平洋岛屿在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辩论会中大声疾呼，因为气候变化对我们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是一种生存威胁，给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安全——都造成集中且不同的影响。

首先是这场危机涉及人的层面。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几个国家已经在将一些社区迁离他们的家园、渔场、祖先的坟墓和祖祖辈辈栖息的土地。

其次，由于盐碱化和海平面上升，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可耕地和地下水。

第三，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应对COVID-19危机时，除COVID-19外，太平洋岛屿还在应对多种卫生威胁，管理更频繁和更持久的登革热、钩端螺旋体病等疾病的爆发。在我们迁移一些卫生设施并强化或重建其他卫生设施以使它们变得更具抵御力时，我们是在打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第四，太平洋岛屿的能源、水资源、机场、码头、道路和桥梁，以及维持和扩大基本服务所需的一切有形基础设施，都在受到气候危机的威胁。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将听到我们的呼吁。这是我们时代的战争。我们不可一边努力应对一些危机，一边选择无视另一些危机。我们不可在今天不断上升的海洋缓慢吞噬一些国家领土的同时，对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本机关的同一些区域冲突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安理会的核心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将通过在执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方面持续和加速取得进展加以履行。如果我们要打赢当代这场战争，那么《巴黎协定》就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武器。

主席先生，你要求为制定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提供指导。为此，我谨提出五项建议。

第一，我全心全意支持太平洋岛屿领导人发出的要求任命一名联合国气候与安全特使的呼吁。

第二，我全力支持若干会员国今天上午发出的呼吁，即应把气候与安全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核心和经常性议程项目。

第三，我敦促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所有机关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合作，以确保将气候变化的和平与安全层面系统性地纳入联合国各机构、方案和基金以及和平行动的工作主流。

第四，作为一个长期的部队派遣国，斐济敦促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会员国合作，准备和更好地定位我们的和平行动，以便在日益复杂并因气候而变得恶劣的维和环境开展行动。

最后，我呼吁联合国尽早召开一次世界领导人峰会，讨论气候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以及联合国的应对措施。该峰会应要求领导人就现有国际架构是否能够应对当代这一挑战发表看法。

附件21

瑙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名义作的发言

作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共同主席之一，我今天荣幸地代表这个有51个成员的小组发言。我感谢马斯外长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感谢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秘书长将气候危机形容为当代决定性问题。海平面继续随着气温上升而上升。在许多地方，严重的洪涝和干旱越来越常见。面临持续的粮食和水不安全情况的人数正在上升，造成人们流离失所。气候变化正在导致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崩溃，而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后果。

实际上，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地的社会构成生存威胁。其影响已在扰乱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和生计，破坏当地经济、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稳定，并加剧暴力冲突。贫穷和脆弱的社区现在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但我们不乏就连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具抵御力的地方也被摧垮的例子。

实现《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目标将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这将需要大幅增加用于适应和缓解行动的资金和技术资源。同时，我们必须处理今天已经在影响我们的气候危机的后果。我们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深感关切，未来数年，这些影响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和儿童，将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民众期望我们行动起来，他们期望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现在就行动起来。

我们肯定并支持在联合国大家庭不同部分，特别是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根据该公约通过的《巴黎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国际文书——框架内开展的其他努力和进程，同时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做得更多。我们今天的会议是自2007年首次将这一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见S/PV.5663）以来安理会成员倡议召开的以往若干次会议的继续。十三年后，取得了一些进展。由于联合国众多会员国、包括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成员在安理会内外的参与，安全理事会有12项决议提到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

然而，仍有很大的余地使安理会的办法变得更强有力和系统化。秘书长在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召开之前曾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带着讲稿来——要带着计划来。”我们既带来了讲稿，也带来了计划。我们认为，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安全理事会，必须志存高远，并以具体行动兑现诺言。

我们呼吁秘书长定期提交全面报告，说明在特定的国家或区域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给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威胁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此类报告应包括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的预警指数和预报进行评估，并为联合国各机关采取行动应对这些风险提出具体建议。这将增强安全理事会在迫在眉睫的危机和冲突成为现实之前予以发现、处理和预防的能力，这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继续授权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在其活动中考虑与气候有关的风险。我们有时听说，维和特派团有比气候变化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关注。虽然乍一看情况好像真是这样，但在许多方面，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维持和平变得更加艰难。驻有最大规模多边和平行动团的10个国家中有8个位于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这很难说是巧合。

我们大力支持由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的气候安全机制。该机制的工作,包括分享信息和开发工具,以促进对气候变化与和平与安全的相互联系形成共识,对于将这一议题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工作主流至关重要。更多的信息意味着更好的理解和更充分的反应。我们还支持任命一名气候与安全特使或特别代表,这名特使或特别代表能够加强联合国相关实体在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方面的协调性。

我们必须将气候视角纳入调解努力和预防性外交。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是冲突预防议程的核心。会员国、秘书处、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特派团必须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所有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活动。我们期望他们在此过程中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办法。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可能会逆转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处境脆弱国家的建设和平和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人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

我们也必须就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加强与国家和区域行为体,包括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气象服务机构的伙伴关系。它们拥有宝贵的知识,直接了解人们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安全风险。我们欢迎非洲联盟采取举措,同时加强自身在气候和安全方面的工作并推进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

最后,气候变化不仅是又一个需要和其他许多风险一起考虑的风险;正如科学和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它是一个危及生存的问题,并有可能威胁到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再次重申,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和义务尽其所能处理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

虽然气候变化带来风险,但它也打开合作的可能性。要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这样做。

附件22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小罗纳尔多·科斯塔的发言

提议在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上讨论气候与安全问题，应该让我们大家停下来思考手头的问题，但更应该思考《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授权的范围。

气候变化是一个国际社会正在应对的不可忽视的复杂问题，应继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组成的国际制度内加以考虑，并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国各自能力的原则。

巴西对气候变化给最脆弱国家造成的影响保持敏感，而且也在考虑如何将发展问题更好地纳入和平努力，同时认为，国际社会也必须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将气候变化议程不当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步骤。因此，在把新出现的关切称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然威胁之前，我们应该力求谨慎行事。

巴西认识到气候变化具有广泛影响和多个层面，强调最重要和最准确的关系不是所谓安全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气候变化问题首先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讨论，因为它需要同时采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办法，而不是安全对策。

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艰巨、多层面的问题时，关键是要对类似所谓“干涉权”——自称有权以可疑理由干预主权国家的事务——的言论的激增保持警惕。

使用诸如“气候与安全的联系”和“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等有争议的措辞可能具有误导性，有可能阻碍实现消除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目标。这些术语可能会强化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甚至是危险的假设，即气候变化必然导致冲突。事实上，冲突的爆发往往取决于多种结构性因素，而非某个单一指标。

试图将军事行动作为预防气候变化的对策完全是有害无益的。没有任何精确的工具可以让国际社会百分之百确定，环境灾难将在何时以及如何最终转化成潜在的安全威胁，因为冲突因具体情况而异，源于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复杂因素。

专家们指出，在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之间建立必然、直接联系的提议牵强附会，同时在若干冲突根源中单独挑出一个，可能会导致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回答，这首先就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解决。

安全理事会必须接受这样的理解，即每一场冲突都有自身具体的根本原因，在维护和平方面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可以适用。换句话说，没有单一的和平模式。

可能导致一个社会走上和平或冲突道路的条件性质复杂，需要深入了解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独特的具体特征。

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只有结合其社会和经济内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将可持续发展内在的不可分割性考虑在内至关重要。

所谓气候与冲突的联系对我们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努力还有另一个有害的副作用——它鼓励发展一种分析安全风险的文化，其中安全风险往往比发展优先事项更受关注。在巴西看来，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现象没有军事背景，不

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这些挑战必须通过发展工具来应对。相反, 我们应该认识到, 它们主要属于发展领域, 不应过度转化为安全问题。

发达国家不应进一步投资于气候议程的安全化, 而应把能源和资源用于促进旨在补偿最脆弱国家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的金融机制。事实上, 如果《气候公约》附件一所列国家不采取必要措施履行减排承诺, 可能会损害国际安全。

任何关于气候和环境问题的专题讨论都必须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保持开放。会员国有责任密切关注联合国系统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 它们在努力实现协同增效和互补的同时应保留各自的任务和能力。

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具体和直接威胁。因此, 它原则上应该避免就拟议专题通过总括性声明, 而是应该选择逐案评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附件23

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哥斯达黎加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极具全球意义的辩论会,并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小组成员——尼日尔国家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杜·马加吉上校和纽埃可持续太平洋咨询公司董事科拉尔·帕西西女士——的发言,这些发言使我们的讨论内容得到丰富。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影响将令影响我们星球的气候紧急情况加剧,这无疑将对当前冲突的状况产生影响,并将引发未来的冲突,在不存在冲突的地方造成安全问题。这是一场全球危机,与我们预期的冠状病毒病发展态势相反,它将会恶化,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危机边缘,如果我们走得太远,后果将不可挽回。

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我们将目睹可怕现实,即我们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而且我们做得还不够。现在就行动起来,这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多边解决办法和国际合作,涉及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

哥斯达黎加认为,气候与安全属于安理会的职权范围,不是要将其任务授权扩大到应对和预防气候变化,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联合国内部得到充分处理,而是在冲突局势中进行预防和采取行动。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定期报告制度,这将使安理会能够随时了解和更新安全风险信息。同样,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向在国家一级运作的联合国机构,包括和平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发出预警,让它们警惕有可能加剧现有冲突的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倍增因素,加重和加剧现有的威胁。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目标,气候灾难将导致从地方到社区一级的社会契约破裂,为争夺资源而破坏国际协议,其对地球的影响将比炸弹和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

正如我们呼吁在这一流行病背景下并永久实现停火和停止资助冲突一样,用于恢复努力的任何一分钱都不应进入化石燃料行业。现在是时候投入资源用于发展可持续的做法,而不是破坏自然的高排放做法了。我们还呼吁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并呼吁安全理事会确保世界上已经稀缺的资源不被转用于军备。

最后,当前的气候紧急情况威胁到人民的生计和他们的生命,导致社会动荡和超越国界的冲突。如果不携手采取行动,我们将看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新的冲突和对维护持久和平的更多威胁。

附件24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塞浦路斯想补充欧洲联盟的发言,以本国名义讲几句。我们欢迎就一个关系到生存的问题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感谢主席国德国和共同组织会议的代表团组织本次辩论会。

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威胁,并且令和平与安全挑战倍增。气候变化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挑战,不分国界,已经影响到和平与安全,它有可能导致或加剧现有的冲突,增加流离失所的民众,令已经存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复杂化,使资源的缺乏和紧张状况加剧,破坏脆弱的冲突后地区的稳定,使发展和人权保护方面的进展倒退,引发移民潮,并极大增加小岛屿国家的固有脆弱性,这些国家已经在应对能够摧毁其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极端现象,它们本身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作为一个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和多年来一直承受气候变化后果的岛屿国家,塞浦路斯极其关切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我们极为关切的不仅是我们由于部分领土被占而没有能力保护我们整个领土上的环境,还有我们领土上的环境退化,这些领土被占领,而对此负有责任的占领国却不受任何究责。

尽管总体上的环境退化,特别是气候变化被确定为安全威胁已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在把环境退化以及其他新出现的非常规安全威胁纳入安全理事会工作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没有在按计划实现把气温上升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摄氏度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必须着手研究气候变化的预期后果。

安理会必须采取一种有条不紊的方法,以便作为更全面的安全方法的一部分,将本次辩论的安全角度纳入其工作,并确保其能够随时应对我们面临的威胁。我们认为,安理会可以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预防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冲突方面。此外,安理会已经可以开始考虑气候变化对其议程上冲突的影响了。

安理会拥有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联合国在全球的广泛存在及其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安理会可以要求国家工作队基于将开发的模板提交关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冲突风险的报告,也可以要求会员国这样做。然而,安理会必须决定将如何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我们认为,安理会拥有的最重要工具是预防性工具,包括鼓励会员国利用司法机制等各种机制,和平解决气候变化现象引起的争端。

附件25

捷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科学气象数据、在我们外交使团驻在国,特别是在非洲和中东各地的实地观察,以及对我们在全世界人道主义干预工作的反思,使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全球数百万人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这种影响有潜在的或已经存在的安全影响,特别是如果与脆弱环境结合在一起的话。

正因为这个原因,捷克共和国在5月份加入了联合国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并承诺积极参与其工作,为开发在全球一级系统管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工具作贡献。

捷克共和国坚决支持把关于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辩论列入安全理事会的经常议程。已有多项安理会决议承认,气候变化和某些冲突之间存在关联。安全理事会密切关注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肯定将增强全球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将提高国际发展合作努力的有效性,并促进成功的气候行动。

捷克共和国感谢德国、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联合王国和越南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推动建立一个能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联合国系统。

我们相信,秘书长根据科学分析和预测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全球气候风险评估报告,并就进一步行动提出建议,这将是建立一个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影响的联合国系统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联合国系统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个系统各级与气候和安全有关的能力。然而,还应该在发展合作框架内对地方和区域两级在气候和安全以及气候学专门知识方面的能力建设给予重视。让当地伙伴也参与进来,将增强我们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分析进行整合的能力。这还将增强地方和区域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责任意识。

附件26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干练地主持7月份的安全理事会工作,并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其不利影响正在损害所有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而且对脆弱局势中的人们影响格外严重;鉴于其全球性质,必须紧急开展国际合作。

全球气温升高、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干旱、海平面上升和各种自然灾害危及人类福祉和生计以及生态系统。这些现象的不利影响造成粮食不安全、失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风险,破坏多年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气候变化的人道主义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包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损失、流离失所、易受剥削的境地以及被边缘化的可能性。仍然令人震惊的是,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获取食物和水,从而危及自己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而且青年有可能被招募,投身暴力极端主义。

我们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拥有必要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是谈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主要政府间论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议题可起到补充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调动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职权范围内的能力。

我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雄心壮志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落实手段,即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进行能力建设,以及转让技术。我们重申平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发展权等原则。

国际社会意识到,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以及野蛮的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会加剧冠状病毒病(COVID-19)等人畜共患的传染病的传播。COVID-19大流行正在对和平与安全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造成新的脆弱性,这一点在本月初变得显而易见。

我们主张,如《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这份载有应对气候相关风险指南和预警机制的文件所述的那样,将预防、能力建设和增强复原力作为减少灾害风险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以确保做好备灾工作,并重建得更好。

必须针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有关国家的局势,为参与和平行动的人员提供评估和遏制冲突局势所需的适当资源、培训、信息和工具。安全理事会可以建议《气候公约》进一步探讨气候变化同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为了做好运作准备,国家机构和驻地协调员的投入也很重要。

和平与安全对于实现可持续性不可或缺。我们希望,本次公开辩论会将调动各方政治意愿,并调集更多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我们战胜大流行病并从中恢复之际。

附件27

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萨蒂延德拉·普拉萨德的发言

首先,我谨表示,我们真诚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德国组织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还谨感谢助理秘书长的深刻见解。我们感谢各位通报者。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之一。它的多层面影响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如洪水、飓风、强风、暴雨、持续干旱和蝗灾,正在破坏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这些威胁的破坏性不仅会影响人类安全,还会影响我们自身的生存。

极端天气事件正在恶化现有族群紧张局势,加剧不平等现象,减少维持生命所需资源的供给和可及性。整个社区的生存和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受到威胁。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已有数百万人每年依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预计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恶化。

事实上,如果不能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所引发的风险作出调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将受阻。我们能否消除饥饿和贫困,确保获得卫生设施和可持续能源,并保证人人拥有体面的工作,都取决于全球能否一致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虽然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在争论之中,但它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无可争议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压力与人口过多、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环境退化密不可分。

因此,管理气候和安全风险需要解决发展不足、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等现象的根源,这些现象往往会导致族群关系紧张、甚至冲突。在牧民和农业社区中,牧场和供水点引起的紧张关系演变成经常性暴力的威胁始终存在。

要缓解此类紧张局势和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就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加强社区抗灾能力,并加倍做出多边努力,履行我们在《2030年议程》、《2063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之下作出的承诺。

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分国家的贫富。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事实上,虽然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受到的影响却尤为严重。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必须立足于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紧急和协调一致地加以全球应对。气候灾害的跨界性影响迫使我们跨界合作,协调我们使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适应战略。

在这方面,我们欣见,近年来联合国对该问题给予了适当关注。我们认为,这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应该继续提高其能力的一个领域。不同国家面临特定的气候变化风险。最不发达国家在面临严重风险的同时,还缺乏必要的预测、预警以及风险评估及适应工具。联合国可协助弥补这种不足,做法是加紧努力以达成共识,提高具体情况下的复原力,以及增强区域和国家的能力,制订和落实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

规模最大的10项多边和平行动中,有8项部署在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这并非纯属偶然。为此,在联合国的驻地国资源、包括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行动中,安理会可发挥重要作用,以提高适应和减轻影响的能力。安理会

还可与相关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协作,把增强复原力、处理气候变化所致安全风险以及支持国家的适应战略等工作纳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任务授权。

非洲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所致安全风险影响的大陆之一。比如,安理会可与非洲联盟(非盟)、政府间发展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其它次区域组织结成伙伴,对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联展开一次全面的研究,并就如何处理由此带来的冲突风险提出行动计划。

此外,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研讨如何系统地处理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同时,它将加大力度支持非盟主导的应对非洲气候变化影响的工作,在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现有的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亟须一种综合性的全球做法,在国家、地区以及国际层面更好地协调规划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工作。

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除平均气温升高和降雨模式变化等直接影响之外,气候变化还表明,必须转入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并为此提供了契机。在这方面,我国的10年发展计划强调了建设气候适应型的绿色经济的重要性。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本周青尼罗的季节性降雨高出均值,使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蓄水成为可能,该大坝是我国的一个重大项目,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巨大潜力。我们相信,不久我们将与埃及和苏丹就大坝的蓄水和年度运作达成协议,这将成为合作和相互依存的一个恒久象征。

为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的发展计划倡导气候适应型的绿色农业。我们还开展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活动,如林业开发以及土壤和水源养护。去年,埃塞俄比亚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植树造林活动,以期遏制气候危机导致的环境退化、毁林以及其它影响。各行各业的埃塞俄比亚人热忱响应,一天中就种下创记录的3.5亿棵树苗。尽管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第二个植树季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之中。

最后,我愿重申,埃塞俄比亚充分致力于加快落实我们在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做出的各项国际和区域承诺。

附件28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哈·伊姆纳泽的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德国和其它各国共同举办今天的高级别活动,讨论气候与安全这个重要问题,并把该问题摆在安全理事会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

格鲁吉亚赞同将以欧洲联盟名义提交的发言(见附件18)。请允许我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气候变化方面的安全风险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千百万民众每日面对的现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是一个风险倍增因素,有可能威胁可持续发展,加剧冲突和不稳定。它可导致本已脆弱的局势恶化,包括加紧争夺土地和水源等稀缺资源,剥夺民众的谋生手段,致其被迫背井离乡。但是,最糟糕的情况尚未来临,特别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科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我们看到全球海平面的水位创下记录,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达到最高,以及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十年。

这些问题对生存构成挑战,只能通过联手坚决行动,包括落实我们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做的承诺,才能得到处理。我们认为,处理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应被摆在安全理事会预防冲突的议事日程上。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安理会近年来取得进展,更多地认可气候变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的不良影响,这反映在多项专题决议和针对具体国家的决议上。

为推动这一共同努力,格鲁吉亚充分致力于实现《气候公约》的各项目标,并赞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结论,即: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确定无疑,如果全球变暖超过工业化前水准的2摄氏度,气候变化造成危险影响的风险将大幅增加。我们还相信,可持续发展目标—处理气候变化被纳入其中的目标13—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防止大难临头的相辅相成的文书。

为此,我们把目标13作为国家级的优先事项,更新了我国对《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的是减少我国的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6月16日,格鲁吉亚交存了接受《〈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接受书。最后,为进一步加大我们的承诺力度,1月23日,政府成立了气候变化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高效落实《气候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格鲁吉亚致力于采取多边努力,处理气候灾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共同努力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附件29

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危地马拉愿感谢担任2020年7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召集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高级别公开视频会议,也感谢秘书长和各位专家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该话题对于和平及安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必需及时和综合处理。

危地马拉是一个得天独厚、极为丰富多彩的国家;然而,由于其地理位置,危地马拉也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过去三十年来,危地马拉不断遭受极端天气事件之害,这些天气事件直接冲击农业和粮食安全,影响人类生活、儿童发展、经济增长和卫生健康,造成移民增多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并影响土著人民的文化特征。因此,我们理解并赞同以下看法:迫切需要在国际层面加紧努力,以实现更可持续和更能抵御气候冲击的发展,这将有助于建立更和平的社会。

我们必须铭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这方面拥有根本性的任务授权;至关重要,所有国家都应履行承诺,尤其是关于为适应气候变化和抵御气候冲击提供资金、减少损失和破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行善治和进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是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必须利用该文书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来指导应对冠状病毒病和从中恢复的努力,推动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尽管各种努力都取得了成功,但气候变化的影响却是真实的。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还必须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授权框架内考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我还要强调,必须注意地球向我们发出的惊人信息。我们多数人所受到的限制给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带来了生命气息。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

气候变化是加剧现有威胁、紧张和动荡的因素之一。它是一项挑战,有可能给环境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最脆弱国家和区域带来过重负担。由此产生的风险不仅是人道主义性质的,而且还关乎政治和安全。为此需要重新评估和强化合作与政治对话,并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这可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而引发改善全球治理的积极趋势。

暴力冲突日益被视为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过去几年来,暴力冲突急剧重现,造成了无边的人间苦难,产生了巨大的全球影响。暴力冲突已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和旷日持久,涉及更多的非国家团体以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这些团体和行为体日益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网络安全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挑战联系在一起。

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也会有利于环境管理。在危地马拉,保护区的管理得到了我们1996年《和平协定》的确认,是世界上一个成功的范例,因为它遵守减少碳排放和保护森林的国际标准,同时也促进社区的发展。

气候变化与安全有着内在的共生关系:每一种威胁都会加剧另一种威胁。危地马拉是一个致力于核裁军的和平国家,主张彻底消除核武器。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核试验和核废料倾倒可能已将地球上一些生态系统破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在此过程中造成整个动物和人类群体流离失所。这种废料对世界

各地的水和土地的污染将持续得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远为更久，造成持久的负面后果，包括给我们的孙子一辈造成这种后果。今年，我们纪念作为全球核不扩散制度基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通过五十周年。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争取实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共同目标。

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人们仍然主要从发展和环境的角度看待它，但它也对国际安全与和平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在这方面，危地马拉欢迎秘书长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本组织全系统的优先事项来对待。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气候变化挑战的严重性正变得更加明显，本机构所有成员，不论是常任成员还是非常任成员，都必须予以透彻考虑。危地马拉认为，重要的是，应促进制定政策和建立科学技术平台来改善国际治理，以加强风险分析能力，并为预警机制作出贡献，这将惠及民众，提高民众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同时尊重人权和预防冲突。

安全理事会应继续探索可采取何种办法来加强预防、早期检测系统和业务行动，以便在考虑到族群紧张状况和治理的情况下避免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资源管理引起冲突。

气候变化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特别是要求各国合作提高新能力，尤其注重发展中国家，力求改善监测、报告和核查系统，以期减少灾害风险。

最后，危地马拉重申，必须把气候变化努力与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这三个支柱的相互依存关系视为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全面办法。

附件30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感谢组织者召开今天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讨论会。米罗斯拉夫·延恰助理秘书长、尼日尔国家战略和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马哈马杜·塞杜·马加吉上校和纽埃可持续太平洋咨询公司董事科拉尔·帕西西女士所作的通报有助于了解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我们立即给予关注的问题。我们已经作出和将会作出的选择将决定未来的气候。

国际社会走到一起，通过各种机制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其中的核心机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现在还有里程碑式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些都是包容性的决策机制，力图就某些基本原则达成全球共识。各国还根据这些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通过各种集体决定，采取了具体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在讨论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时，我们需要先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毫不顾及这些原则的架构。例如，在把气候变化视为安全问题时，如果安全理事会因会员国未作出本国依照《巴黎协定》决定作出的贡献而追究其责任，这将是可接受的吗？各国将会因未提供充足的气候资助而被追究责任吗？安理会将会让各国因未分享有益于气候的技术而承担责任吗？

气候变化是一个多维性的问题，从狭隘的安全角度看待气候变化，等于是把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使之脱离实际。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目前正通过基于重点行动和广泛原则的包容性全球进程来处理。让我们加强这一做法，而不要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惩罚性措施来纠正气候变化问题。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许多政府、组织、科学家、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提出一套说辞，称气候变化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政治不稳定、争夺资源、暴力冲突、移民，甚至恐怖主义和激进化。此外，他们说，这些后果总会不可避免地始于全球南方原本就贫困的国家，但这股浪潮终会抵达发达国家的边界。这些都是危言耸听的场景。出于某种理由，气候变化安全化概念的倡导者认为，当一个问题被描绘成一种生存威胁时，公众就更愿意接受例外或极端的政策对策，否则这些对策就会站不住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关于人类安全的第12章明确指出，“有关气候变化和气候可变性对暴力产生的影响的证据受到质疑”。当冲突的起因被过分简化，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气候变化将导致暴力冲突时，如果预防这种实际具有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的冲突的措施只把冲突作为一个安全问题对待，那么就很容易忽视这些方面。我们不要只发出警告，而是要有宏伟目标。

世界实际需要的是在各级采取果断行动，改变气候变化威胁的轨迹。虽然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但在单方面努力的同时继续加强多边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努力需要认识到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所面临的多样化挑战及其具备的能力。因此，这些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将因其国家能力和责任而异。

此外，对全球变暖负有首要责任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兑现其资助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事业的承诺，也没有提供碳清除技术。我们没有看到出台一项强有力的减缓、适应和复原战略，以最大限度减少气候变化对一些最脆弱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而是看到一个激进的举动，将目标转向气候变化安全化，而不是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

印度是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推动方。我们已采取一些重大措施来遏制气候变化，承担对我们地球的责任。过去几年来，我们每年减少了3800万吨碳排放。我们设定了一些额外目标，包括到2022年消除一次性塑料，到2030年有450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并恢复2600万公顷退化的土地。

印度坚信，在气候变化领域采取持久、长期和积极行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伙伴关系，要采取明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凭空发出警告，以产生持久和可持续的影响。

通过伙伴关系采取积极的全球气候行动的一个实例是，印度总理与法国总统一道，倡议建立国际太阳能联盟。印度已经根据我们的信贷额度，承诺为各国的太阳能项目投入17亿美元。莫迪总理还主动倡导建立具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联盟。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是秉持南南合作精神的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体现。

展望未来，遏制气候变化的进展取决于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转化为行动。因此，这一代人的政府、工商业和民间社会有责任单独或通过合作加快行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出对气候更友好的选择，逐渐向无碳生活方式转变：例如包括低碳住宅、零排放交通和有机饮食。但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民、领导者和活动家的力量或许更加重要。

让我们本着“世界是一个大家庭”的精神共同努力。这就是印度处理全球问题的一贯方式。让我们将气候变化视为加强多边主义和寻求公平、包容各方的解决方案的机会，建设一个更加环保、更加清洁和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附件31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巴赫尔·乌卢姆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我荣幸地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今天的讨论表明, 这个重要问题是国际社会关切的核心。我赞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前任主席国法国主动倡议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谨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发言, 这有助于我们确定对话的背景。

我们认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最佳联合国论坛。然而, 我们认为这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辩论会是一项国际责任, 也是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避免此类风险和危机的必要预防措施。这场辩论会将提高我们对气候变化危险的认识, 气候变化对立足于和平、发展和人权这三大支柱的联合国构成挑战。我们认为, 气候变化会对这三大支柱产生不利影响。

地球表面温度上升即便本身不是直接或有形的威胁, 也肯定会加剧另一些众所周知的风险。在世界上某些区域, 包括我们所在区域, 这种威胁更加复杂, 因为它们阻碍我们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尤其是目标2、6、13和15。

降雨量不足和水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加剧了用水短缺问题, 进一步耗竭了这片土地的重要资源, 引发流离失所和移民。联合国知道因为经济和环境原因而流离失所或被迫移民者的惊人数量。虽然在海上遇难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 但是参加这次虚拟会议和其他活动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迁移的原因。

我们认为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都感兴趣的议题, 而且通常从全球角度讨论, 但同时我们要强调气候变化对整个中东, 尤其是对伊拉克的最重要影响。

令人警惕的是, 在缺乏有效的双边或多边公约, 或缺乏管理公平合理使用共享水资源的区域框架的情况下, 由于各方争夺共享水资源的使用和控制权, 一些主要河流流域, 特别是在中东,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各方无视那些保障所有沿海国家权利的国际法原则及其公认的职权范围。气候变化也起到一定作用。

国际社会应该进行积极的预防性干预, 以加强人们的生存能力和稳定, 遏制脆弱生态系统或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正常生活的极端变化——也就是支持适应气候变化方案。这样的步骤不仅是必要的; 从环境或经济角度来看, 这比试图安置移民或恢复他们抛弃的土地的代价更低。

例如, 我要提到海湾入口处伊拉克三角洲环境的严重恶化, 这是一条被称为阿拉伯河的著名水道, 被人描绘成辛巴达传奇的历史所在地, 根据某些圣书和宗教记载, 它也是伊甸园的所在地。由于来自支流的淡水减少, 它成为了生态被迫转变的突出实例, 从以生物多样性、沃土和茂密棕榈林为特征的淡水生态系统变成以咸水为主的环境。

我们尤其不能忽视恐怖分子对民用供水设施的破坏; 恐怖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 而不是地方现象。尽管对于许多地区恐怖主义的根源有不同的理论, 但事实是, 不稳定以及经济和社会脆弱性助长极端主义、偏执和报复心理的蔓延。因此, 必须采取不同办法来缓解处于爆发边缘的动荡地区的紧张局

势。因此，我们呼吁将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纳入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努力。

伊拉克赞扬国际社会与我国站在一起，帮助击败我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同时强烈呼吁尊重我国水权，保护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支流免遭彻底破坏；这种努力将为促进安全、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另外，我要提一下第2421(2018)号决议，该决议延长了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的任务期限，并首次将水和环境问题纳入了援助团的任务授权。在这方面，2018年2月21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提到了跨界水资源的联合管理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联伊援助团：第一，监测气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并将其纳入向安全理事会的定期通报；第二，组织旨在帮助伊拉克开展建设能力的研讨会，以便在中短期内了解气候导致的安全风险；第三，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促进旨在解决水资源相关挑战和环境挑战的区域对话；第四，在帮助从恐怖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中解放的地区恢复的计划中，帮助伊拉克当局应对气候导致的流离失所、经济脆弱性和社会不稳定问题。

最后，我国政府希望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伊拉克正在努力与邻国一起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并希望采取河岸国家共同合作的办法，以公正合理的方式分享利益、分担负担。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现象，不受政治界限限制。因此，可以通过基于国际法规定的全面区域办法；以河岸国家之间外交为基础的倡议，例如水外交和全球安全倡议；以及环保智能型方案，来防止出现紧张和不稳定局势。这些措施将创造有利于击败恐怖主义的环境、加快各部门基础设施重建、促进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附件32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提交的发言(见附件18)以及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提交的发言(见附件21),并希望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意见。

今天的讨论承袭安全理事会成员自2007年以来就气候与安全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问题组织的一系列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辩论会、公开通报会和“阿里亚办法”会议。意大利在2017年发挥自身作用,组织了一次关于为气温上升的安全影响做准备的“阿里亚办法”会议。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赞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席声明S/PRST/2011/15发表近九年后,德国正在通过今天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会继续这一讨论,并在与瑙鲁共同主持的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内持续引领讨论。我们也赞扬其他共同提案国这些年来积极主动地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议题。我们希望未来的安理会成员也接过接力棒。连续性确实是关键。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预测,未来五年有多个月的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C的可能性是70%,至少有一年全球年均温升超过1.5°C的可能性是20%。正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概述的那样,世界显然没有在按计划实现将全球温升限制在1.5°C范围内的目标。尽管该报告没有明确把重点放在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上,但它清楚地强调,全球变暖将增加国家脆弱性和不稳定的风险。在全球变暖超过1.5°C的情况下,预计对健康、生计、粮食安全、供水、人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气候相关风险将大幅增加。

在世界某些地区,与气候相关的多层面挑战极为艰巨。非洲仅占全球碳排放量的4%。然而,面临气候风险和政治脆弱性风险的国家中有57%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是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的突出例证。乍得湖的面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缩小了90%,这加剧了对水和稀缺资源的竞争,导致大规模移民、贩运和恐怖主义,其倍增效应有可能破坏撒哈拉以南和地中海地区的稳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难性事件的冲击。热带风暴和飓风、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等气候灾害,加上现有的经济和安全脆弱性,可能会导致远远超出政府管控能力的危机。

气候变化并没有因为冠状病毒病(COVID-19)而停止。相反,虽然气候变化与COVID-19之间并无已知的直接联系,但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我们可能会看到媒介传播性疾病加剧传播。随着气温的升高,这些物种将能够在以前无法生存国家和地区生存。气候变化也对我们的健康构成直接威胁,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导致局势更加不稳定。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强调,必须加强和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如果我们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重大安全后果,减缓、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的努力就日益紧迫。为了响应秘书长的紧急呼吁,我们应该加倍努力,确保迅速有效地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我们纪念其五周年之际打造政治势头,并在米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及格拉斯哥2021年11月的成功会议之前,在2021年9月30日至10月2日米兰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有效推动各国作出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并增加财政承诺。

将来在格拉斯哥会议之前举行的探讨气候和安全层面问题的区域安全会议,可以在突出气候和安全相关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更多地参与总体气候行动,也可以更有益和具体地处理气候与安全之间的相

互联系。意大利将发挥其作为二十国集团继任主席的职能，致力于增强不同多边论坛和进程之间的协同作用。

尽管脆弱地区在短期内面临最严重的后果，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风险是全球性的、相互关联的。没有人能躲过这场风暴。

在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前夕，许多现代安全挑战无法被清晰地纳入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安全和治理架构的最初构想。环境退化以及最突出的气候变化问题跨越国界。因此，世界必须规划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预测、预防和防备这些可预见的跨境威胁。

要预测这些威胁，需要具备通过可靠信息和相关科学技术预见气候变化最严重后果的技术能力。在这方面，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通过部署卫星技术来更好地监测天气变化、降雨模式、土壤湿度、湿度、冰川质量平衡和河流流量，从而能够进行精确评估。例如，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以通过欧洲联盟(欧盟)管理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收集的数据为依据的。另一个例子是伽利略项目，这是一个由欧盟创建的全球导航系统，意大利对此积极作出贡献，在意大利和德国设有地面操作中心。

预防意味着积极化解与气候相关的威胁——换句话说，从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转向行动。由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的气候安全机制是非常及时和有效的手段，可以有系统地纳入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分析，同时促进做出支持性应对。但是，迄今为止，预防仍然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它需要有能力和意愿，通过解决冲突根源和有效利用预防性外交工具，并且加强或调整对不受气候影响的脆弱地区的发展援助，这些地区有可能是不稳定的热点地区，从长期角度出发、采取把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方式投入资源。这项任务现在更加艰巨，因为全世界的注意力完全向COVID-19紧急应对和社会经济复苏倾斜。

准备还意味着利用现有信息加强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这意味着把对气候相关威胁的风险评估纳入多边、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战略层面政策决定——摸底调查风险较高的领域，并努力使应对措施常规化、制度化、得到整合和提升。我们2017年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主要致力于这一层面。我们在2017年担任七国集团主席期间，在这些方面也特别积极，当时我们主持了七国集团气候变化和脆弱性工作组的的工作。

正如我们在COVID-19危机中亲眼所见，全球冲击是突然的。关于气候变化，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科学警告，即潜在的全球冲击可能会产生比COVID-19大流行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能够预测、预防并作好准备。

附件33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石兼公博的发言

我谨感谢德国组织本次气候与安全会议。和冠状病毒病(COVID-19)一样,气候变化对全球的人的安全构成威胁。它的性质不同于安理会一直处理的武装冲突。然而,正如第2349(2017)号决议所确认的那样,在乍得湖流域地区,气候变化和生态变化等因素确实对区域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日本从人的安全的角度看待气候变化,就像它看待COVID-19一样。日本认为,概念说明(S/2020/725,附文)中提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的安全影响,应当根据它们对人们的生存、生计和尊严造成的负担程度来衡量。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如缺水、干旱、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粮食不安全,严重影响了萨赫勒及其他干旱地区的人民。海平面上升和海岸线侵蚀威胁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热带气旋的情况下,例如今年4月侵袭太平洋岛屿的哈罗德气旋和去年夏天肆虐加勒比海岸的多里安飓风。包括日本在内的温带地区的居民也几乎每年都会遭受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在全球各个角落,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正在危及人的安全。在社区缺乏复原力的一些地方,它们成为令和平与安全风险倍增的因素。

为应对人的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那些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并进而影响和平与安全的挑战,我们需要以人为本、全面、针对具体情况以及面向预防的对策,它们可以加强对所有人和所有社区的保护和赋权。我们还必须考虑并采取全面行动——超越部门条块分割——充分考虑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需求和人权之间的相互联系。

日本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安全和全球繁荣的威胁,也是当代复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挑战之一,因此,我们通过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太平洋岛屿领导人会议以及日本-加勒比共同体框架等进程,推动与受严重影响国家之间的对话。日本承诺在2020年提供1.3万亿日元——约118亿美元——支持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任何旨在把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包括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努力,都必须采取中长期措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仅仅治标不足以阻止气候变化或冲突。除非我们通过环境和增长的良性循环,建设有复原力、可持续和不存在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否则,我们将无法实现和平与安全。《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是建设气候变化造成自然灾害的社区抵御力的最有效工具。尽最大努力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即使是在受冲突影响和处于脆弱局势的国家中也这样做,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最后,我谨强调,联合国必须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便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各个方面。日本将坚定不移并积极参与这一努力。

附件34

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阿迈勒·穆达拉里的发言

我们感谢德国和共同组织本次及时和极其重要公开辩论的国家。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安全挑战是所有人都关切的问题，因此，本次辩论会非常重要。本次会议以部长形式举行证明了这一议题的紧迫性，我们对海科·马斯阁下主持本次公开辩论会表示赞赏。

气候变化对当前全球挑战——无论是地缘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挑战——来说，是一个威胁倍增因素。为有效应对气候危机，应对措施应与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生计、经济和生态系统相结合。把气候变化与安全解决方案纳入协调的政府一体化办法，是朝建立真正复原力迈出的重要一步。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史性的，特别是对移民而言。根据《纽约时报》杂志本周援引的最新研究，由于酷热和干旱，数亿人不得不在逃离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由此导致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移民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季风降雨和干旱，已有800多万人迁徙到中东、欧洲和北美。同一期《纽约时报》杂志警告说：

“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由于干旱和大范围的农作物，数百万农村人口涌向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如果逃离炎热气候的规模达到目前研究表明的可能程度，这将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版图的大变动”。

此类移民让我们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感到非常担忧。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涉及人、经济和安全等方面，我们各国没有能力应对。例如，人们如果因为缺乏资源或极端天气事件而被迫移民，可能加剧黎巴嫩境内目前已经发生的流离失所危机。这只会使粮食安全和基本服务基础设施的状况恶化。此种雪上加霜的效应会将黎巴嫩推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更加不可能实现和平。

落实和遵守始终是根本。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实现《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将减少气候灾害，从根本上缓解适应的需要，从而保障和平。

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我们认为，可以在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之间建立正式和牢固的合作关系，以分享调查结果，提高应对气候风险的效率。

必须加强备灾。在这方面，气专委的工作不容忽视。其中包括查明每个区域的气候风险和脆弱性。应当将这些科学发现纳入安全理事会应对冲突风险工作的主流。可根据气专委查明的气候脆弱地区，找出冲突热点，或重新确定应对这些热点问题的优先次序。《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路线图及其在脆弱国家当地的实施，也可以成为在极端天气事件可能造成的冲突中加强备灾的切入点。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气候事件的概率和地理情况。气候对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更大。获取更多气候风险信息，同时全面了解当地的准备情况，将是调动资源和提高安理会准备状态的第一步。

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杂志，地球在未来50年内的气温升幅可能高于过去6000年的总和。这将是对地球上的生命——人类和自然生物——的最大威胁。今天，我国的象征，也就是作为黎巴嫩标志的雪松

树——黎巴嫩雪松，正因为气候变化而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逆转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到本世纪末黎巴嫩雪松可能绝迹。这提醒人们——如果需要提醒的话——气候变化也会危及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千年象征、文化和历史。

附件35

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利用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机会，提请我们今天注意当今时代的重要问题。我们希望，本次公开视频会议将推动安理会对气候与安全联系的审议，此种审议非常必要。

为了解安理会在将气候与安全的联系纳入考虑方面有多迟缓，有必要看看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是如何论述这一联系的。秘书长将近11年前提交大会的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安全影响的报告(A/64/350)预测，气候变化将导致非自愿移民、国内水资源冲突和领土争端以及粮食和供水无保障状况加剧。如今天辩论会的概念说明所认识到的那样，

“除其他外，气候变化的（这些）影响可能导致粮食不安全、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社会紧张局势，从而加剧或延长冲突，或增加未来冲突的风险。”(S/2020/725, 附文, 第2段)。

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中看到了这些动态，其中包括：在也门，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种植和获取清洁水的能力下降，从而加重苦难；在乍得湖流域，供水减少导致农牧民发生冲突，促使人民移民；在索马里，干旱加剧导致谋生办法缺乏，加剧贫困，进而引发并延长冲突。安理会据此处理气候对其工作的影响刻不容缓，特别是鉴于过去十年来气候变化一直在不断加剧。

然而，安理会应该做得更多。迄今为止，它对待气候问题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将其视为一个次要因素。安理会提及气候的决议与非洲大陆国家的局势有关，只是将气候视为加重或加剧其他冲突根源的因素。但是，如秘书长报告所解释的那样，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会使威胁倍增的因素，它是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内外数亿人不安安全的根源，而且绝不仅限于非洲。

许多会员国担心极端天气事件或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全球变暖大大增加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而按照目前的预测，海平面上升将使整个国家无法居住，或在我们有生之年完全消失。土著人民依然特别容易因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和生境发生剧变而受到影响。全球变暖本身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对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构成生存威胁。还有什么比这更攸关和平与安全？

我们从那些反对有系统地关注气候与安全的人那里听到的一个论点是，安全理事会并非联合国机构中最适于处理气候问题的机构。列支敦士登肯定联合国各机构在此问题上拥有的专门知识，并鼓励安理会更多地利用整个联合国系统现有的力量和能力，特别是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安全机制，以增强对气候与安全联系的认识。然而，反对安理会就气候问题开展工作的基本论点是一种只注重“硬安全”的安全模式，这种模式早已过时，这一点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过程中暴露无遗。如果安全理事会不接受反映我们各国所处现实的更广泛安全概念，那么它就要冒一个具体风险：在作为和平与安全守护者履行职责时，继续使自己陷于瘫痪。

目前由COVID-19大流行对人类构成的安全威胁必须成为安理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原因。经济停摆可能导致了排放的暂时放缓，但在迅速重启经济的努力中必须利用尽可能最清洁的能源生产形式，以免出现反复、甚至可

能进一步倒退的情况。重建得更好,以应对大流行病,也意味着建设更绿色、更可持续的经济。COVID-19以及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等挑战还促使全球注意到,人类必须负责任地管理全球生物多样性。

今天辩论会的概念说明强调,必须采取一种能够为安理会决策提供信息,促进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评估,并使安理会能作出适当反应的办法,应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的第一步,可以通过一项关于气候与安全的安理会决议,建立一个报告机制,对联合国系统、包括其专门机构内已积累的大量专门知识加以利用。

安理会还可以考虑一个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组成的工作队是否能够通过定期通报及其他方式提供相关专门知识和信息来加强安理会在气候与安全关联性问题上的参与。在该工作队成立之前,必须更系统地提及全球变暖对安理会所处理局势,特别是非洲大陆以外局势的影响。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附件36

卢森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卢森堡完全赞同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见附件18)。

我们谨感谢并赞扬主席国德国以及安全理事会其他共同支持这一倡议的成员召开今天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放眼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引发更加严重和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天气事件、更加频繁和严重的洪涝、持续非常久的干旱、海平面上升和自然灾害,造成水和粮食短缺,在某些情况下还助长大流行病的蔓延。气候变化的这些效应还可能增加冲突风险、特别是因争夺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而爆发冲突的风险,加剧现有冲突,并对全球安全构成新的挑战。显然,正如为今天的辩论会编写的概念说明(见S/2020/725, 附文)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的影响会使威胁倍增,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

许多正在发生的冲突,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发生的冲突,根植于因争夺自然资源、特别是农田和牧场而爆发的争端,由于过度使用并受气候变化影响,这些农田和牧场的生产力正在下降。在主要依靠雨水浇灌的生产系统中,长期干旱和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天气模式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在许多地方,农村土地保有者的管理制度似乎不再起作用。在这些地方,人口密度急剧增加,当地族群开始武装自己,以保卫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不被其他族群占领或使用。如果不消除这些会使威胁倍增的因素,像萨赫勒这样的地区就难以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安全理事会自2007年以来一直参与处理这个问题,自2011年7月以来尤其如此。在此过程中,安理会在突出强调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相互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联合国得以更系统和更有效地处理这些相互联系。政治建设和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努力主导建立的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机制与伙伴联合开发了一个工具箱,以便提出分析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的共同办法,并及时制定综合对策。

在我们看来,将特别包括预警指数的这一工具箱纳入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评估框架至关重要。这将使联合国能够尽早发现和评估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状态和脆弱性有关的安全风险,以及与自然资源的状况及其治理有关的安全风险。在这一努力中,联合国若与欧洲联盟、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发展伙伴合作,将会获益匪浅。

由此获得的信息应当用于能充实定期向安全理事会作的通报。这一信息应当还能为有所层面的共同反应提供分析依据,包括为加强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实地特派团把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其预防和反应行动的能力提供这种依据。

卢森堡支持加强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的作用和手段,使之能够向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提供战略性咨询意见。这会有助于通过调解、从环境角度建设和平、更好地治理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增加复原力建设,来加强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

协调是关键。应鼓励国家一级的联合国机构在各自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内以更加协调和有效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同时, 至关重要是, 联合国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行为体应与处理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人权和法治等问题的行为体更密切地合作。联合国和平行动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而且还应能够处理在争夺土地等自然资源时爆发的冲突, 与此同时, 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需要对冲突更加敏感, 从而顾及所有利益攸关方和族群的安全和长期发展需求。

作为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与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世界最高的国家, 以及作为国际发展、安全和国防领域的可靠伙伴, 卢森堡实施“3D”对外政策, 把外交(Diplomacy)、可持续发展(Development)和国防(Defence)三种工具结合起来使用。因此, 卢森堡支持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 这些努力导致自然资源的管理得到了改善, 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以及作为由此带来的红利, 和平与安全得到了实现。

附件37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墨西哥感谢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联合王国和越南要求召开今天关于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辩论会。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一极具灾难性的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

我们确信,本次会议将使我们能够推进就在一些情况下气候变化在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的讨论。尽管安全理事会不是负责应对这一现象所带来全球威胁的机构,但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加剧动荡的风险。我们谈论的不只是可能会因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加剧的极端事件,例如干旱或洪涝,而且还有各种长期环境退化,例如海平面上升或农业生产能力丧失。所有这些情况都给一些地区的人们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支持秘书长以各种方式表明,投入于预防的各方面工作极为重要。对国际社会来说,这样做的成本将低于对冲突本身作出反应的成本。在这方面,必须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分析能力,以期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如何能够增加在特定局势中可能给安全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

随着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内伙伴关系机制的建立,体制架构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该部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起开展的工作将有助于我们完善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那种全面分析。

气候变化现象的后果是多层面的。因此,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多层面的。实地现实要求采取一致、协调和综合的行动。在安理会提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联系的局势中,不仅驻有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也驻有发展系统。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在风险分析中纳入发展系统在实地观察到的趋势,反之亦然,从而使已确定的发展挑战得到预防式应对,而不成为安全问题。归根结底,冲突的结构性原因必须得到解决。

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所述,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必须以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为指导,同样,安全理事会也必须就其职权范围内的具体情况逐案获得最佳分析。这样,安理会决策能够考虑到实地的现实,做到高效和有效。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对发展的重大挑战,必须根据这一领域的国际承诺加以全面应对,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安全理事会对具体情况中的气候问题的关注必须补充多边气候变化体系正在开展的工作,该体系力争在减缓、适应、融资、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更具雄心。墨西哥积极参与这些领域的工作,并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最后,墨西哥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提高对气候变化对某些冲突的影响的认识,并赋予联合国系统各部门处理风险因素和实施必要应对措施的最佳能力和工具。以真正全面和协调的方式共同努力,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某些影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挑战的最佳方式。

附件38

尼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姆里特·拉伊的发言

首先,我感谢主席国德国和其他共同提案国——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尼日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联合王国和越南——组织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主题的部长级公开辩论会。我也要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深刻通报。

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并有可能超越国界。此外,非传统和新出现的威胁对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挑战。

当前的冠状病毒病疫情清楚地提醒我们,许多安全威胁来自于看不见的敌人。它也揭示了全球合作中的自满情绪,暴露出我们完全缺乏准备。

气候变化对生存的严峻威胁,特别是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脆弱国家的威胁,存在已久。诸如海平面上升、飓风、山体滑坡、暴雨和极端天气条件等气候引发的灾害影响了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环境移民,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秩序稳定。这种情形和困难的升级会引发冲突。

特殊处境国家,如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受到气候灾难的影响。任何国家,不论多强大,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需要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作出一致和全面的努力。必须支持特殊处境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更容易获得透明、直接的气候融资和技术,以应对气候危机。

安全理事会只需发出其集体承诺的信息,就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安理会成员必须以身作则。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现有的气候变化框架表示政治支持同样重要。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谈到对确保全球共同命运安全的集体承诺。然而,执行方面的挑战十分突出。

我们若是无力加大气候行动,不仅会危及地球的健康,也会危及人民的安全和保障。因此,不应仅仅在事后想起气候行动,或将其视为对我们政策的补充。如果我们要确保一个有保障的世界和人类的安全,它必须成为核心工作的一部分。

作为山地国家,尼泊尔仍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国的排放量微乎其微,却受到过重负担。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去年发表的一份关于印度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报告警告说,如果继续采取一切照旧的做法,到2100年,本地区多达三分之二的冰川将会融化。这可能会影响到水和其他资源的供应,包括山区以外如维系10多亿人的河流流域的粮食供应。诸如喜马拉雅山脉雪冠消融、冰湖溃决导致的洪水以及一些稀有动植物的灭绝等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最后,尼泊尔谨敦促所有国家注意气候变化对各国人民和地球的灾难性影响发出的无声呼吁,并从人类利益出发,真正应对这场危机。

附件39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萨姆森·埃泰格博耶的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组织和共同发起今天公开辩论会的所有代表团。我们特别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的发言和意义深远的建议。我们也感谢其他通报人分享他们对这一重要议题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谨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意见。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挑战,给全人类带来不同程度的负担。在暴力冲突、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动荡地区,可以看到气候变化对男子和妇女都产生明显影响,导致粮食不安全和生计丧失,这有可能逆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气候变化的累积效应导致气温上升、降雨量变化、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干旱、荒漠化、土地退化、极端天气条件、淡水资源减少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从而剥夺所有人的生计。妇女是非洲等地的主要农业劳动力,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为严重,这加剧性别不平等,影响产妇健康和妇女的经济生产力,并增加性别暴力的风险。

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民众已经在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多重风险,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阻碍市场准入、扰乱供应链并限制通行,由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导致市场关闭。在卫生和环卫设施不足的难民营中,由于气候方面的发展,流离失所者缺乏保持社交距离的能力,构成又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安全风险情景,有可能导致大量感染,并可能蔓延到附近社区。因此,COVID-19疫情暴露了隐藏的不平等,以及复原和复苏的前景。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增,围绕重要自然资源,尤其是水和牧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这种争夺对尼日利亚及其它非洲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安全影响。尼日利亚的农牧民危机持续不断,表明了气候变化和资源控制交互影响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深蒂固的安全挑战。

气候变化还与萨赫勒地区的迁徙、恐怖主义和农牧民冲突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导致了涉及全副武装游牧牧民相关的致残、杀戮、强奸以及其它形式的盗匪行为。传统上为该地区社区提供生计手段的生态系统日益丧失,继续导致被迫流离失所和迁徙问题。

乍得湖流域曾经是生活在流域周围八个非洲国家公民繁忙生产、粮食安全和财富的聚集地,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流域面积与原来的规模相比已大幅缩小。这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因为该地区遭受与“博科圣地”恐怖团体等武装团体有关的暴力影响。在干旱期间寻求其它生计的农民和牧民的行动受到限制,这限制了他们实现收入多样化的机会,从而使他们面临更多脆弱性,如武装团体招募青年以及绑架和奴役妇女。

我们谨回顾,秘书长于2019年9月23日召开了气候行动首脑会议,以便在气候危机日益恶化的情况下集中全球注意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支持实现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级领导人都被要求挺身直面挑战,表明一切照旧的做法不再是可接受的。气候行动首脑会议为气候行动确定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但它也强调了在哪些领域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确保我们坚实地朝着到本世纪末把温度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迈进。

换言之，气候行动首脑会议强化了把1.5摄氏度作为本世纪末全球升温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安全极限，以及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是全球所有人的长期气候目标。会议呼吁所有国家紧急加快工作，确定这将对短期（2020年）和中期（2030年）的承诺将意味着什么，这将体现在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中，并确保旨在实现这些承诺的战略之间的一致性。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世界需要采取更切实的措施来减缓我们地球健康状况的快速恶化。所有领导人都必需按照秘书长的要求，加快采取气候行动。尼日利亚坚定不移致力于履行其《巴黎协定》义务，特别是我们的国家自主贡献所体现的愿望，包括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无条件减少20%，有条件减少45%。

尼日利亚正在带头努力，为引水补充乍得湖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改善在该地区定居的人口的生活条件，促进可持续性生产活动，改善国家间的合作和跨界流通，加强适应和社区复原力，同时协助应对威胁该地区及其资源和居民的环境和安全风险。为此，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恢复方案并最终敲定乍得湖流域气候变化复原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一项估计耗资550亿美元的跨流域调水项目。

尼日利亚还支持发行绿色债券，将其作为创新性替代项目资金来源，以这些项目将减少排放并提供尼日利亚所需的强有力气候基础设施，如可再生能源、低碳交通、供水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农业。我们发行了主权债券，用于在我国不同地缘政治区域的七所联邦大学提供离网可再生能源，并且在一些未得到服务和不足的地区，特别是该国的农村社区生产和分配离网可再生能源资源，过去两年中，减排高达4188804公吨，在尼日利亚全国2000多公顷的土地上创造绿色就业和植树。

为表明承诺，我们将再次发行下一批债券，我们打算利用它们使尼日利亚的温室气体减排增加两倍、刺激经济增长，并促进对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方案的投资。我们将继续打造包括私营部门和区域各国政府在内的全球伙伴关系互利联盟，以应对乍得湖地区面临的社会经济和安全挑战。

尼日利亚还打算对国家自主贡献进行向上审查，以便到2020年时把更多部门包括进去。在水资源部门，尼日利亚正在根据水资源综合管理原则，为灌溉和建造发电、灌溉和供水多用途大坝承销绿色债券。在废物管理部门，尼日利亚制定了拟定国家固体和液体废物政策的计划，并委托在国家和州一级进行废物转化为能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吸引私营部门投资者。

尼日利亚将继续采取措施，建立六个地缘政治区域中心，利用尼日利亚青年的创新气候理念，并将我们的青年纳入决策进程，作为我们整体气候变化治理架构的一部分。我们还将继续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创造青年创业/绿色就业机会，并在现有的农业银行、工业银行和尼日利亚开发银行内设立青年创新基金。我们还将动员尼日利亚青年种植2500万棵树，以增加尼日利亚的碳汇。

总之，无可否认，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一现象，我们呼吁通过共同协作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附件40

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请允许我真诚感谢德国发挥领导作用，把重要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问题纳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我们感谢各位通报人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看法。

我们坚信，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责任，也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因为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应该作出全面和更统筹一体的应对。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

现在时候已到：我们应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地球，并实施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帮助我们阻止全球变暖及其后果。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正在对人们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必须按照《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卡托维兹规则手册》减少排放。我们还必须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挑战，例如粮食和供水短缺、干旱、流离失所、洪水和争夺自然资源。

我们知道，将感受到气候变化后果的主要是治理不力和存在社会经济挑战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将特别影响萨赫勒地区、非洲、岛屿国家和亚洲的脆弱民众。正因为此，维稳努力和建设和平必须考虑到气候问题。必须更加重视预防工作。

有鉴于此，我要强调使用新技术和数据来预测风险的重要性。我们赞扬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的工作。风险评估和管理战略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分享知识、经验和能力建设，对于建设抵御能力至关重要。我们相信，有了基于可靠的气候安全风险数据的有效预警系统，我们就可以改进预测，从而更好地预防疾病爆发。

正如波兰在2018年和2019年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在安理会会议上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认为应当通过安理会的定期讨论以及在针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局势的决议中进一步突出气候安全风险。波兰将支持秘书长就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联系问题提交定期报告。此外，为了确保更有效地预防冲突，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全面办法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因此，还必须将气候安全风险纳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努力，并在适当情况下考虑将其纳入和平行动的任务范围。

总之，应对气候变化安全风险需要多边措施和区域合作，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有助于我们就该问题的紧迫性确立共识，并推动这一议程向前发展。我们不应该失去动力。在我们应对冠状病毒病影响的此时，重建得更好、更环保以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附件41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科·杜阿尔特·洛佩斯的发言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提交的发言（见附件18）。作为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成员，葡萄牙也愿赞同该小组提交的联名发言（见附件21）。

这场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重大危机的全球性卫生危机，似乎让我们感到确认气候变化是当代决定性挑战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而，气候危机仍然存在。当我们战胜这场疫情时，它还将存在，并将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影响。

实际上，这场全球流行病应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继续放宽视野，而不是局限于传统上与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因素。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和平与安全问题，同时适当考虑到跨领域、多层面的主题，例如移民、妇女与青年、卫生与气候。气候变化是导致威胁倍增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本已脆弱的地区。自然资源减少所造成的争夺现象加剧了现有冲突。海平面上升、降雨过多和长期干旱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从而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稳定，这常常导致人们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移居他方。

近年来，联合国系统在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其分析和行动方面取得了进展。气候安全机制就很好地说明了所取得的进展和需要采取的整体做法。安全理事会自身已将气候变化对和平与稳定的影响纳入了若干决议，并在一些专题辩论和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导致威胁倍增的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更系统地处理气候与安全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鼓励安理会继续授权维持和平行动在其活动中考虑与气候有关的风险。联合国和会员国还应加强参与这些行动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查明和应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

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气候安全机制，增强其在知识整合和推动整个联合国系统大力运用知识方面的作用。数据收集和分析具有关键意义，能够确保安全理事会掌握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对冲突环境的影响方面的权威信息，并可开发工具，建立伙伴关系和预警能力，从而支持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及时评估和响应，防止冲突升级。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更密切的参与将会产生更大价值。

此外，应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方面的分析和认识更好地纳入联合国和会员国所开展的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工作，这项工作需要认识到气候变化、预防冲突与维持和平的相互联系，制定适当的预警以及风险预防和管理策略。

为了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方法，使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与发展支柱更加紧密地协作，我们必须考虑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的作用。利用建和委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咨询作用以及国别小组所作的值得欢迎的承诺，即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之前提供书面建议，也可以成为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联系问题纳入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具体讨论的一种方式。

最后，我们应该放眼联合国系统之外，听取一直在收集数据并对这种联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民间社会和学术组织，以及与实地相关方面，特别是处于应对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工作最前列、并有宝贵的经验证据的国家的看法。

附件42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首先, 主席先生, 我们要感谢你就气候变化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问题召开本次至关重要的辩论会。我们也感谢通报者宝贵的全面介绍。

今天的会议是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举行的, 即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带来巨大挑战, 对生计产生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增加, 随之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干旱、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资源匮乏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 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冲突的爆发和持续。

虽然没有任何国家幸免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因为气候变化现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但处境脆弱的民众对这些不利影响的感觉最深, 不论其处境脆弱的原因是地理状况、贫困还是其他一些因素。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情况就是如此。

除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维护人权的能力有着重大影响外, 气候变化同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现在, 安全理事会已在工作中处理这一联系; 若干决议注意到气候变化对和平与稳定的影响。然而, 仍需采取综合办法, 以更好地了解 and 评估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其对冲突的影响以及预警的必要性, 这将使安理会能够有效和适当地应对这些风险、预防冲突和维护和平。

卡塔尔为应对气候变化而作出的努力不限于国家层面; 卡塔尔国在国际层面发挥了直接领导作用。鉴于迫切需要消除气候变化的负面后果, 而这一努力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反应, 卡塔尔一直是国际社会中的积极伙伴。卡塔尔在组织2019年9月举行的气候行动峰会方面发挥了开创性作用, 该峰会由卡塔尔国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殿下与法国和牙买加共同领导。这三个国家组成了气候融资和碳定价联盟。

卡塔尔埃米尔捐款1亿美元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他这样做就是要显示, 卡塔尔极为认真地对待本国以及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并突出表明, 必须在联合国的国际框架内加紧和加速采取集体行动, 以便系统地处理这一问题。

卡塔尔发展基金正在努力敲定兑付机制, 以履行该承诺。已经确定三个层面的工作来为该机制奠定基础, 这三个层面的工作是: 筹资、政策支持与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宣传。将在考虑到下列三个优先部门的情况下采取多部门发展合作办法: 教育,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关键支柱; 经济发展; 以及卫生, 因为气候变化影响到保健方案和系统。

鉴于需要开展综合性的合作和行动, 该战略旨在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努力实现《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提出的宏伟目标, 并通过有利于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广泛、可持续和有效的发展努力取得长期成果。

卡塔尔因致力于开展国际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而闻名于世。特别是荒漠化, 会给受影响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 卡塔尔埃米尔发起了倡议, 要求建立全球旱地联盟, 这一机制的宗旨是在遭受旱灾的国家实现粮食安全, 从而帮助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建立该联盟的协议于2017年在多哈缔结, 并已根据其规定在缔约国批准之后生效。

环境发展是《卡塔尔2030年国家愿景》的基石之一。卡塔尔通过了若干计划和方案,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特别是通过促进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这样做。有一个这样的项目要求到2030年把对太阳能的依赖度提高到20%。

卡塔尔投资局正在投资于气候融资项目,并且是2017年在巴黎举行的“一个星球”峰会上设立的“一个星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创始成员,该基金的宗旨是提高全球资本划拨效率和推动顺利过渡到更可持续的低碳经济。

我国对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的承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2012年,卡塔尔主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八届会议。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履行我们依照《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所作的承诺。

最后,在多边行动方面,卡塔尔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以应对作为人类所面临最大挑战之一的气候变化。

附件43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大韩民国欢迎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因为本次会议为讨论气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风险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我们愿强调以下三点，以便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重要议题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大韩民国认为，气候变化不仅会使威胁倍增，而且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年年都在增加。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防备气候变化的连锁效应，以实现全球和平。

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各地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其中许多事件规模空前。这包括极端的干旱和洪涝、灼热的热浪、失控的野火以及危险的超级风暴和飓风。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事件剥夺了人们的生计。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些事件还成为区域动荡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认为，不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安全风险，就无法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需要为此采取更具体的行动。例如，韩国致力于2019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起的和平森林倡议，该倡议通过协作修复和恢复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区域退化的土地和森林促进和平与信任。这种努力能够促进交流，激发经济协作，最终有助于缓解政治紧张。

第二，大韩民国赞扬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关迄今在气候与安全问题上展现的领导能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应得到加强。安理会需要提升待命状态，以评估和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从而把讨论转化为更具体的成果。

在这方面，大韩民国欢迎建立气候安全机制以及该机制采取的各种举措，包括公布一个工具箱。该工具箱是专门知识和案例研究的最新汇编，将不仅为联合国工作人员、而且为所有会员国规划如何处理这一复杂问题提供良好的指导。我们认为，应根据会员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更新该工具箱，使之可持续地充当向前迈进的有益政策指针。

我们还支持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同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的全面报告，并支持安全理事会定期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议。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会员国的认识和推动会员国采取行动。

作为具体成果，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乍得湖的决议(第2349(2017)号决议)、关于西非和萨赫勒的主席声明(S/PRST/2018/3和S/PRST/2019/7)、关于索马里的决议(第2408(2018)号决议)、关于马里的决议(第2423(2018)号决议)、关于达尔富尔的决议(第2429(2018)号决议)和关于非洲的决议(第2457(2019)号决议)，所有这些决议和主席声明都提到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

此外，我们需要采取联合国全系统办法来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因此，联合国各机构需要更好地相互协调。我们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最近通过的关于向萨赫勒地区提供国际支助的第2020/2号决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在这方面给人以启发。该决议指出，联合国相关机构和会员国应当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最终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大韩民国曾积极参与制定该决议，将继续为贯彻落实该决议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 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战略来处理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影响。这场疫情正以空前的规模损害我们各国社会和经济, 并有可能阻碍我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从COVID-19中重建得更好, 我们的恢复计划需要把有关气候变化考量和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摆在核心位置。

作为确保更绿恢复的雄心勃勃的具体计划, 韩国政府宣布了被称为“韩国新政”的一揽子恢复方案, 由下列三个支柱组成: “数字新政”、“绿色新政”以及强化社会安全网。特别是“韩国绿色新政”, 追求低碳和可持续经济目标, 投资绿色部门, 创造绿色新工作岗位。这最终会使韩国经济符合《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因为我们正致力于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 我们认为这对于减少全球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至关重要。

COVID-19疫情显示, 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才能确保国际安全和繁荣。为防止气候危机进一步升级成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开展国际合作并支持联合国全系统行动至关重要。大韩民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并支持这方面的努力。

附件44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法文]

首先,我谨欢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主持下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这再次表明安全理事会特别关心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问题。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以及我们今天的通报者尼日尔国家战略和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马哈马杜·塞杜·马加吉上校和可持续太平洋咨询公司董事科拉尔·帕西西女士以及青年代表所作的重要发言。

无需在此重申气候变化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除交替发生的干旱和洪涝外,我们还看到不时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现象加剧了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挑战:贫困、饥饿、粮食不安全、移民、境内流离失所、经济崩溃、族群间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等。

在这方面,10个最大多边和平行动团中有8个驻在萨赫勒和中东这两个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国家,这几乎不令人感到惊讶。

根据2020年7月17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27个最有可能因冠状病毒病而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多数是已在应对极端天气情况的紧张热点,这也绝非巧合。

在这份清单上,我还可以加上沙漠蝗虫群,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些沙漠蝗虫群自今年1月以来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形成,未来数周可能向西非移动,从而可能殃及萨赫勒的一个地区,而该地区由于遭受多重危机,已经处于动荡之中。

因此,不言而喻,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着侵蚀性的影响。现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仅取决于我们有益于气候的集体行动,而且还取决于我们旨在避免争夺自然资源的努力。在世界若干地区,自然资源已经变得匮乏。

争夺自然资源会引发乃至加剧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对立双方往往利用其资源遭出售、被外国势力垄断,或者简单地说,管理不善和分配不均作为论据。

然而,除争夺资源酿成的冲突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直接威胁到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因此产生了地球安全的理念。

为使会员国能够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关于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信息,并就这一问题建言献策,提出想法,向它们提出了五个问题。还请会员国分享本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经验。

我想把这些问题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问题:联合国在气候变化影响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紧张热点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或者更具体地说,联合国系统应开展什么形式的外交来预防冲突、包括气候变化?为回答这个问题,我脑海中浮现出三个基本想法。

第一,在我看来,在安全理事会内部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层面力求更好地协调各方在气候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很重要。

第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气候与安全倡议取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所有相关公约执行工作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多边参照框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气候融资必须充分进行,尤其是在适应方面,因为这是支持和维持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并进而预防冲突的活动的有效途径。

我还要借此机会回顾,在2020年后调集资源来补充绿色气候基金必须是个优先事项,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适应气候变化,进而提高抵御能力。

在发言末尾,我谨向安理会介绍我国与挪威作为非洲和北欧国家加强多边合作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倡议的一部分于2020年3月3日和4日在达喀尔共同举办的关于特别是在萨赫勒开展多边合作来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和发展风险问题的次区域会议得出一些结论。在该会议上,除其他外,确认了下列因素。

第一,有必要把气候层面纳入和平-安全-发展环节,在努力促进萨赫勒和平与安全时尤需如此,同时不要忽视性别层面。妇女不仅是与气候相关的主要受害者,而且还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必须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委员会在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问题上的合作。

第三,我们必须投资于有复原力的农业工作,以应对冲突和气候变化,并特别关注年轻人。

第四,我们必须紧急采取一项适当考虑受影响民众真正关切问题的包容性战略,以便与他们一道努力,增强他们的复原力。

如果我不提及马里、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和我国塞内加尔四国之间在跨界水域管理方面成功合作的例子,那将是我的失职。我们各国组成了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该组织评估因水资源需求而可能产生的冲突风险,因为可用水资源正日益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因此,我们于2015年3月11日在科纳克里发表了塞内加尔河流域开发组织国家元首宣言,内容涉及气候变化以及执行将在塞内加尔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综合项目第二阶段和2014-2021年塞内加尔河流域水资源多用途开发项目框架内适用的具体规定。

塞内加尔还采取了跨界生物多样性管理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塞内加尔三角洲跨界生物圈保护区——应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请求,该保护区于2012年成为教科文组织指定的地点——以及塞内加尔和几内亚之间的尼奥科罗-科巴和巴迪尔国家公园。

附件45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米哈尔·姆利纳日的发言

斯洛伐克赞扬德国倡议组织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强调人类安全与环境安全之间的联系。

我国代表团赞同欧洲联盟提交的发言(见附件18)。

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历史上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冠状病毒病提醒我们，生命岌岌可危，并且相互关联。我们的世界已经很脆弱，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加剧，暴力冲突、人道主义需求和流离失所等现象在过去十年都有所增加。

随着频繁的干旱、洪水、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气候灾害导致人道主义灾难、粮食短缺以及经济、社会和人口冲击，并可能加剧已经压倒一切的挑战，特别是对资源不足、脆弱的国家政府而言。

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倡导时刻，拟定了气候议程。斯洛伐克坚决支持气候行动、和平、人权和法治。我国总统苏珊娜·恰普托娃女士在气候行动首脑会议上重申了对价值观、和平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用她的话说：

“如果我们成功地团结起来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就能在其他领域创造一种新的团结感。这可以成为克服国家之间分歧的基础，并带来新的机会。”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国际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绝对必须成为预防冲突议程上的一个关键项目。这是预测明天的威胁和帮助最脆弱国家的唯一途径。

鉴于气候已经对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我们需要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发挥作用。我们感谢德国在安全理事会气候和安全领域进行了出色领导。

国际社会必须迅速行动。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建立一个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综合数据库。我们应该将短期和长期气候和环境风险因素纳入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评估和管理。我们鼓励国际社会利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专长，并且加强本组织在实地的特派团，以便找到应对这些风险的行动对策。

由于气候安全机制在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政治建和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领导下开展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必须继续寻找解决气候变化对冲突的影响的方法，并寻求必要的全球应对政策。斯洛伐克与德国以及其他几个伙伴一道，希望秘书长每两年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不仅将提供对具体风险的明确评估和分析，还将提出行动建议。

联合国的应对行动应与安全理事会携手合作，并侧重于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维持和平和复原力。必须克服体制和部门分歧，以更加综合统筹的方式开展工作，把人道主义、发展、减缓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行动联系起来。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妇女和女孩更容易受到气候和安全的影响。由环境署、妇女署、开发署和政治建和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性别、气候和

安全:在气候变化的最前沿维持包容性和平》揭示了性别、气候和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报告显示,站在气候行动第一线的妇女正在预防冲突和可持续、包容性和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持地方自主权、改善领导力和扩大冲突和脆弱环境中的包容性,对性别平等和青年给予特别关注,仍然至关重要。

联合国应尽其所能,与区域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在这一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企业和地方当局等非国家行为体合作,牵头促进和协调全球气候行动努力。多边主义是一个关键工具,能够并且应该带来全球解决方案,包括气候变化。斯洛伐克完全致力于在这一集体责任中发挥作用。

附件46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西班牙赞同欧洲联盟提交的发言(见附件18)和瑙鲁代表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提交的发言(见附件21)。我谨感谢德国为召开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的辩论所做的努力,并感谢通报人作了内容非常详实的发言。

我想集中谈三个问题。

第一,冠状病毒病危机表明,气候变化、污染、栖息地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社会和经济脆弱性加剧的根源。脆弱性越大,社会就越容易遭受安全风险。毫无疑问,在世界从这一大流行病中复苏作规划,以及在制定从战略到战术层面的安全政策时,应把气候变化视作一个贯穿各领域的问题。然而,这不应影响针对具体国家的分析。

我的第二点是关于气候和安全之间的联系。西班牙继续支持秘书长关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的定期综合报告,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此类报告必须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把供联合国机构采取行动的具体建议包括进去,并且能够利用综合了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在预防冲突和应对灾害的战略规划中,以及在与冲突和自然灾害有关的实地行动范畴内,都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必须从整体上并在区域一级加强联合国系统,才能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气候与安全机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应予以加强。我们还支持建立气候与安全问题特使、实地特设专家组和秘书长咨询部门等新机制。

我们大力强调气候与安全存在紧密联系这种一般性原则。西班牙在几个论坛上都提倡采取这种做法,包括我们在气候行动峰会上共同领导气候行动联盟下属社会和政治动因小组工作期间。

最后,我要谈谈第三点。还应鼓励各国采取措施。西班牙已将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分析纳入其国家安全战略。我们监控趋势和后果。今天,我们建议建立一种协调机制,使各国能够自愿分享本国数据和执行本国战略的经验。

我们正面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所经受的最严重危机。我们要在应对措施中处理气候和安全问题,实现更好、更安全的复苏。

附件47

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气候变化是国家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迫切且日益严重的威胁，其影响在全球都感受得到。因此，斯里兰卡欢迎今天就气候与安全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突发性大疫病正在全球肆虐，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气候变化，正成为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实际上，我们今天之所以处于这种困境，正是因为我们把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而且在利用环境时没有考虑到后果。与看得见的敌人不同，气候变化这个无形之敌已悄然来袭，几乎看不到，也几乎听不到。但它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毁灭生命、破坏财产、削弱经济、威胁各国生存。

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农业生产力下降；饮水和灌溉水短缺，导致相关的饥渴风险；疾病发生率上升、地域范围扩大；人类迁徙方式改变和大变动；还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经济产出和贸易方式的变化对经济和人类造成的损失。在脆弱和冲突局势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加剧现有紧张局势，使冲突更可能发生，且更加激烈和持久。它的影响可以为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提供沃土。

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也是主要的安全威胁，因为受其影响者很容易成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不仅容易受疾病造成的物质和社会经济影响，而且容易遭受营养不良和收入损失，而这会刺激他们实施犯罪和暴力。实际上，气候变化导致了气候难民，这可以改变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面貌，进而会造成从小型犯罪到国家间冲突的许多安全问题，对和平社会构成威胁，气候变化还可能给人道主义援助带来压力。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的生计和安全受到威胁。

斯里兰卡深切关注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环境特别是岛屿国家的破坏性影响。气候变化继续阻碍各国和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并有可能使迄今取得的进展倒退。因此，根据我们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所作的承诺，建设脆弱社区和生态系统的抵御能力，抵御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斯里兰卡的优先事项。斯里兰卡认为，各国需要达成一项公平和雄心勃勃的协议，才能实现长期的温度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斯里兰卡也高兴地加入到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来应对当前和预计的气候变化挑战的努力。虽然气候变化如何与冲突驱动因素相互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就此问题开发更好的工具并提交更好的报告。

为此，我们需要采取包括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对策以及长期经济发展和治理方案在内的整体方针。我们亟须承认，应对气候变化对维持和平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自满。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并增强抵御能力。否则，就极有可能真正发生动荡和世界许多地区冲突加剧的情况。

斯里兰卡在保护环境以及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珍贵的自然资源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它还支持并致力于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斯里兰卡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不陌生，我国继续倡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在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以应对这些挑战。气候相关协议必须得到遵守和维护。这包括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世界要想在确保全面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前进,就必须这样做。

斯里兰卡坚信,仅靠各国政府无法遏制气候变化和巩固安全。在我们减轻和适应这种威胁的努力中,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以及青年、妇女和土著社区等主要利益攸关方,对于我们努力与这种隐蔽的敌人作斗争以及消除其对国家和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大家必须及时走到一起,共同应对这个问题。

附件48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法文]

瑞士谨感谢德国组织这次辩论会及与会者的发言。气候变化对全球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并加剧了现有的脆弱因素和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与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等现有的冲突驱动因素结合在一起, 会导致风险成倍增加, 使冲突更有可能发生、更激烈、更持久。

瑞士正在采取行动限制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 例如, 通过我们于2010年启动的“蓝色和平”倡议。该倡议支持跨境合作, 促进就获取水源问题开展对话。我们是“南森倡议”的联合主席, 并支持“灾难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当灾难或气候变化影响导致强迫流离失所时, 它们可以成为社会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动因。

我们确认, 急需采取主动步骤, 以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安理会从第2349 (2017)号决议起就确认了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我们欣见安理会近年来取得进展, 在其工作成果中纳入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措词, 并指出必须加强对索马里、马里、西非、萨赫勒以及达尔富尔等局势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评估。

瑞士愿强调安全理事会可推动减少气候安全风险的三方面行动。首先,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互依存性表明, 气候行动贯穿联合国三大支柱领域的多项议程和机构。安全理事会已认可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 现在必须充分处理气候变化对和平安全的影响。

安理会应采纳一种敏锐应对性别层面的做法, 肯定青年要发挥的创新作用。瑞士赞赏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和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继续参与。我们支持该小组的共同立场, 呼吁提出一项针对具体区域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有关气候方面安全风险的秘书长报告。利用联合国内部现有架构的定期报告对于有效处理这些风险至关重要。

其次, 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其议程上的区域或国别局势时, 应系统性地纳入气候方面的安全风险, 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内部可用的信息与资源。这要求预警系统能够系统地识别那些气候变化导致风险倍增的情况, 以便制订充分的对策。气候数据收集、气候情境分析以及预警系统已得到成功运用。在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内部交流这些知识、开展协同增效举足轻重。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协调应使这些挑战能够得到妥善应对。

第三,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的大流行加剧气候危机, 深化社会不平等, 威胁和平与安全。它增加了受冲突、不稳定以及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居民的脆弱性。气候变化、COVID-19以及冲突这三者的影响叠加在一起, 导致千百万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尤其是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以及流离失所者面临风险。绝不能以COVID-19为借口, 听任在气候保护工作上开倒车。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必须始终是一个优先事项。

在此背景下, 瑞士支持安全理事会加大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介入。越来越有必要把气候变化、脆弱性以及冲突风险这三个方面摆在一起加以处理。必须系统、综合考虑气候变化问题, 以防止冲突, 加大复原

力和适应措施的力度。气候与发展政策必须提高对冲突的敏感认识,而安全政策则必须更加敏锐地顾及气候问题。

附件49

图瓦卢常驻联合国代表Samuelu Laloni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在联合国派驻代表的太平洋岛屿论坛以下14个成员国做本次发言：澳大利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基里巴斯、瑙鲁、新西兰、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瓦努阿图以及我本人的国家图瓦卢。

我们谨代表本集团，感谢共同主办方举行本次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重大辩论会。我们还愿借此机会，向那些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蒙受生命损失的国家表示慰问与声援。

关于气候与安全，气候变化是对太平洋各国人民生计、安全以及福祉的单一最大威胁。作为太平洋岛屿论坛，今天我们集体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是因为气候与本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显而易见。当气候变化的影响与一系列复杂的环境、经济以及社会问题彼此交织时，它就成为导致威胁倍增的因素，可显著推动社会和政治不安定以及初级和更加暴力的冲突。

太平洋地区受到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如风暴潮和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降雨模式更加变化无常而干旱期更长所致的不利气候的影响。太平洋岛屿国家尤其易受这些影响，因为其人口广泛分布在农村，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极易受到气候危险与海洋变化的影响。这些威胁的叠加和增多可压垮应对和恢复工作，导致治理和安全崩溃，引发动荡，给本地区的福祉和生计带来一系列广泛影响。关于太平洋的对策，太平洋领导人在《区域安全波伊宣言》和《立即采取紧急气候变化行动的凯纳基（Kainaki）二宣言》中确认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安全风险严峻，但是补救方式依然明确。

减少气候所致冲突的最佳方式是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坚实行动。各国必须做出更多减排努力，落实而不是宣传国家自主贡献，以减少未来气候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营造的全球势头，以确保它坚持各项宗旨与原则，并且得到有效落实。为了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国的共同繁荣与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把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任何退而求其次的做法都将向世人发出我们不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号。

减缓气候变化仍是减少气候影响最有效的方式，同时还需要增加投入，以确保弱势国家能够有效适应已经在发生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强复原力、减少灾害风险以及提高适应能力将使国家能够在气候事件变成安全挑战之前更好地应对。

关于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具体影响，应由一位新任命的气候与安全特别报告员来协调联合国的应对工作。

关于COVID-19和太平洋地区，随着我们转入大流行病的恢复工作，我们面对百年一遇的契机和责任，优先投入于向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过渡。各国在制订对策时，应反思秘书长对安排恢复工作提出的气候方面的原则。安全理事会要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强调这种多层面挑战的安全层面，而且鼓励在这些风险导致冲突之前努力加以处理。我们认为，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1款所倡导的预防性安全的精神。

各种国际性机制和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各种联合国机制必须在一切相关工作和活动中认可气候变化,视之作为一种独特的导致威胁倍增的因素。安全理事会能够并且应该支持那些旨在确保全球经济对策符合《巴黎协定》原则与目标的呼吁。

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国切身了解气候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重要性。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 and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采取行动,以一种统筹和创新的方式处理这个全球性挑战。

检验人道主义和发展之间关联的试金石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没有和平及人的安全,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我们继续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各成员一道,开展这项紧急而关键的工作。

附件5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纳·努赛贝的发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要感谢德国组织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气候变化的工作。我们还要感谢各位通报人的通报。

自德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首次在安理会讨论气候安全问题以来，我们早就过了仅仅承认气候变化与安全存在联系阶段。世界各地，包括我国所在区域，有大量证据表明，干旱、极端天气模式、荒漠化和其他气候影响会如何导致社会动荡、失业、资源争夺和流离失所。这些因素都极大助长了冲突、暴力和恐怖团体的招募，对青年和儿童、妇女和残疾人产生了过大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不再将气候问题安全化与气候问题军事化混为一谈。

因此，我们今天想就如何在安全理事会框架内以可能的方式落实气候-安全的联系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认为，安理会将得益于对其议程上各个局势中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的强化和标准化分析，这种分析以气候安全机制的工作为基础。在现阶段，我们会支持在气候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局势中，对特派团工作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培训，以便他们能够利用类似方法，将气候纳入其面向安理会提交的文件及其自身方案编制中。我们还期望现有的国内资源，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道主义协调员和其他机构，能够提供这种能力的一部分。

第二，我们呼吁进一步发展联合国防患于未然的能力。我们赞扬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其他伙伴在建模和分析方面的投入，以推动在已被可靠预测的、往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和压力出现之前提供资金。对于及早行动在生命和开支方面可以避免的代价，不同估算数字差距很大——每投资一美元，可省下7至50美元——但这清楚地表明，及早行动是联合国系统必须遵循的方向。我们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审议中使用这些与气候相关的预测，目的是在危机失控之前而不是之后调集资源和行动起来。

第三，我们相信安理会授权的特派团所秉持的“不伤害”原则。特派团应加强指导和内部控制，以确保不会加剧当地气候影响，如地下水枯竭或森林砍伐。可再生能源也应成为特派团能源供应的首选，其额外的好处是，在几乎所有的多年派驻任务中，可再生能源都比柴油便宜，并可作为和平红利的一部分，为当地社区创建长期基础设施。我们强调能源和平伙伴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安全理事会针对气候变化的对策需要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分及各伙伴协调，并且必须聚焦于预防冲突和适应气候变化，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显然，在易受气候变化和不安全影响的国家，注重复原力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活动必须增加，才能减少冲突的可能性，这是防患于未然这一整体概念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关于气候影响的警告能够在国际机构，包括其决策机构中引起相应的反响，反之亦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致力于推进这一办法。

我们相信，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能够促进以务实、注重成果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日益增长、此起彼伏的安全威胁。这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安全理事会能够而且必须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附件51

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的闭幕词

我将作简短发言。

今天的讨论证明, 由于各会员国在本论坛和其他论坛的支持和领导, 我们在努力理解和开始处理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行动落后于言辞。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影响的多边对策比不上我们所面临挑战的规模。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必须加快步伐。在这方面, 从秘书处角度来看, 我们期待在各级开展更多的伙伴关系和协作。